

远东巷引出老饭店

11月16日，“跟着美食游武汉”一经启幕即上热搜，武汉城市魅力跃上舌尖，山海关路又一次成为顶流，网上吃货跟进喊话：“山海关路挤爆了就去远东巷。”

远东巷在哪？六渡桥前进一路、民意路之间，响当当的“过早一条街”。咬出江氏糯米鸡的满口余香，打量老旧房子的简陋逼仄，不免也会纳闷：何以“远东”？

这么一顶帽子确实太大，可人家就是有来历。

1920年，那时还叫后城马路的中山大道，斜对着南洋大楼，一幢五层楼西式旅馆拔地而起。每一层长长的阳台全线贯通，加上屋顶耸立方形塔楼，说它像一艘巨轮一点也不为过。起初，它叫安东饭店，转手之后新老板图景气，改名远东饭店。那么，一条小巷跟风搭车，也就顺理成章了。

武汉许多老地名，背后都有故事，这故事便是历史。与远东巷平行的舞台巷，从来只见巷子不见舞台，原有一个“新汉舞台”锣鼓喧天，不过是上一辈人的记忆了。

远东饭店身处闹市，拥有客房80间，设施现代，装潢时尚，规模和档次不在话下。尤其在楼顶设有“夜花园”，与汉口大旅馆楼顶的“楼外楼”、璇宫饭店楼顶的“凌霄宫”遥遥相望，号称三大娱乐窝子，达官贵人彻夜销魂。

1938年武汉沦陷后，汪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武汉行营”占用远东饭店，均由大汉奸叶蓬出任上将主任。1949年，人民解放军四野接管远东饭店为招待所，用于集结南下的北方干部，后交于武汉百货公司设立第三门市部。1956年，改称六渡桥门市部，尔后“购物在六门”叫响三镇。

“六门”经营品种8000余种，年销售额1000余万元，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乃至1993年大扩张，将六渡桥十字街口的另三个拐角纳入版图，分别修筑为桥南、桥北、桥西三个商场。

桥南商场在“六门”对面的三民路口，原是1924年落成的中南旅社，四层带塔楼，每层也是长长的阳台全线贯通，建筑风格与远东饭店形成呼应。中南旅社连同其后的北洋酒家，皆是六渡桥地标，香港理发厅和老会宾、德华两大酒楼落座其间。

时光过去百年，“温州城”代替“六门”，留下远东饭店的旧影，与一些老饭店相依为伴。到民生路，1924年的甲子大旅社、1919年的大华饭店、1921年的长江饭店，赫赫有名；到江汉路，1915年的汉口大旅馆、1928年的璇宫饭店、1937年的海陆饭店，坐拥繁华。到黎黄陂路、蔡锷路，1926年的东方旅社、1919年的德明饭店，各具风光。

如今这些老饭店，除汉口大旅馆（解放后改名人民饭店）让位于地铁站台，都还立在街头，默默讲述过往。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迁入大华饭店，见证大革命风起云涌。1928年夏明翰在东方旅社被捕就义，留下的“绝命诗”义薄云天。1949年武汉军管会进驻德明饭店，擘画江城新生。1961年毛泽东在璇宫饭店宴请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一同品尝武昌鱼……

远东巷网红于市井，远东饭店湮没于烟尘，幸而历史尚未走远，不时这么悄悄回来。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 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辑：许 濛 刘 玮

封面设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远东巷引出老饭店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1945，汉口《大刚报》走向武汉《长江日报》
/ 罗建华

风雨同舟

<<< <

11 承冯公亚佛遗风 做新时代的接力者 / 柴隽雯

九城同心

<<< <

15 我与东腔戏的六十年守望
/ 盛翠平(口述) 王高扬(整理)

委员天地

<<< <

21 此身系乡土，此心传大爱
/ 魏剑英(口述) 梅慧香(整理)

目录

CONTENTS

烽火江城

<<< <

- 25 董必武在汉口安仁里 / 何裕生 陈义 张海龙
30 富源里：抗战初期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所在地 / 田联申
35 武汉抗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下）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十二 / 涂文学
45 不朽丰碑：抗战纪念场所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五 / 邓正兵 王钢

都市寻踪

<<< <

- 51 民国时期的江苏旅汉同乡会 / 陈迟

扫街探疑

<<< <

- 56 汉口长江书店旧址与裕丰公司 / 韩少斌

目录索引

<<< <

- 60 本刊 2025 年总目录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1945，汉口《大刚报》走向武汉《长江日报》

◇ 罗建华

轮印：80年前的1945年11月9日，汉口《大刚报》创刊。1952年1月1日，《大刚报》转型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1953年1月1日，《新武汉报》更名为《长江日报》。

1949年5月23日，中原局、东北局南下人员接管国民党《武汉日报》，创刊华中局、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史称“中南《长江日报》”。

1952年1月1日，汉口《大刚报》由民营报纸通过公私合营，转型为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1953年1月1日更名为《长江日报》，史称“武汉《长江日报》”。

《大刚报》诞生于抗战之初，不畏国民党官方断供停刊，坚持爱国救亡自成一家；自立于抗战胜利之初，拒绝国民党CC派利诱收买，坚持民主进步走向光明；转型于解放之初，通过公私合营扶持发展，步入党报行列焕发新生。

进步力量的两次抉择

《大刚报》初为国民党军队系统报纸，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河北保定筹备，11月9日在河南郑州创刊。

《武汉市志·新闻志》记载：“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刘峙资助创办，国民党中央宣部每月津贴2000元，由毛健吾任社长。”其背景是中宣部长邵力子考虑华北前线应有一份报纸宣传抗日，提请河南省政府拨款2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武汉近代新闻史》介绍：毛健吾为刘峙所属国民党军队政治部上校党务科长，兼任河南和平通讯社社长，担任《大刚报》社长后投身新闻界，成为著名报人。

1938年6月8日，日军开始围攻进逼武汉，《大刚报》迁至信阳出版。战火日炽之际，各方接济断绝，国民党中央宣部新任部长周佛海更下令停办中止津贴。《大刚报》

同仁不甘半途而废，决定自行筹资经营，由官报变为同仁合作的民营报纸，继续为抗日救亡发声。

1938年11月，《大刚报》随着战火蔓延辗转大西南，途中不得不三次停刊，又三次在衡阳、柳州、贵阳复刊，在报界传出“三遭轰炸，四迁社址”的佳话，锤炼出“愈炸愈奋，至大至刚”的“大刚精神”。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于进步报人受中共人士影响，肩负民族大义，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为办报方针，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浙江、四川等地赢得广大读者。因此，被当局开过“天窗”、罚过停刊。日军迫近贵阳时，毛健吾前往重庆筹办《大刚报》，当局以“重庆报纸数量已多”而拒发执照。

1945年抗战胜利，《大刚报》从大后方归来，一分为三，分别迁往上海、南京、汉口。上海《大刚报》未予批准，胎死腹中。南京《大刚报》引入官股，陈立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落入国民党CC系手中。毛健吾被排除在报社最高领导层之外，多次抗争无果，只得于1948年流落美国。1949年，毛健吾在香港加入民革并参加起义，1951年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此后到天津《进步日报》、北京《大公报》工作，并担任民革团结委员会、对台委员会委员。

汉口《大刚报》秉持民间立场，拒绝官方的拉拢和渗透，于1945年11月9日创刊，与南京《大刚报》分道扬镳。这个11月9日非常巧合，也许是刻意而为，与《大刚报》1937年创刊为同一天，时隔整整8年，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最后胜利。

国共决战关头，《大刚报》追求进步，利用国民党派系特别是蒋桂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谋求生存空间，努力反映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愿望。



交通路40号生活书店《大刚报》旧址

汉口《大刚报》设在汉口交通路40号生活书店，这里有一批新闻出版机构，组成“文化一条街”，进步人士聚集较多，有利于共同团结战斗。

不久，南京《大刚报》一些同仁不满黑暗统治和CC系排挤，也投奔汉口《大刚报》抱团取暖。

抗战前后，《大刚报》进步力量的两次抉择，顺应了历史潮流，站到了人民一边。

中共党组织的长期影响

《大刚报》进步力量为何能正确作出两次抉择？

《大刚报》由羊枣（杨潮）、俞颂华、叶启芳先后任总编辑。羊枣为上海“左联”骨干，1933年加入中共。俞颂华为进步报人，

1937年4月赴陕北采访，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接见；叶启芳也为进步报人，1925年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抱有爱国情怀和新闻良知，又与中共人士、进步报人有着密切联系，得到引导和支持。在宣传抗战方面，《大刚报》以“星期评论”“战地通讯”二者见长，范长江、胡愈之、张友渔、金仲华、羊枣、穆欣、唐海等著名报人经常供稿，为之提升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也在具体业务上给予大力帮助。

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围困中原野战军，中共代表周恩来参与和谈和军事调停抵达武汉，考虑根据国共合作的形势发展，在武汉办一份党报，安排南方局文委负责人邵荃麟随董必武前来筹备。

邵荃麟与汉口《大刚报》社长王淮冰是国际新闻社的老朋友，因此借住报社大半年之久。王淮冰1939年到《大刚报》当战地记者，经范长江介绍，参加中共领导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后任《大刚报》总编辑、社长（全国解放后任江苏省新华日报社秘书长、省记协秘书长、省社联常务副主席），二人具有良好的情感、思想交流基础。

邵荃麟时常与王淮冰等主要编辑人员讨论办报工作，特别对社论和“群众之声”提出建议，对《大刚报》坚持进步的方向产生很大影响，使之“在华中一带成为很有影响，并受进步人士欢迎的报纸”——这是时在汉口美国新闻处任职的邹荻帆，在《邵荃麟在〈大刚报〉的日子里》一文中的回忆。

邹荻帆回忆说，“他（邵荃麟）到了武汉后，国民党假和谈、假调处、真备战的实质日益暴露。他与当时住在德明饭店的中共代表如薛子正，另外还有当时在武汉的董必武同志，经常取得联系”，“实际上把他

的一部分主要精力花在汉口《大刚报》上，使这张报纸起了表达人民呼声的作用”。

邹荻帆举例说，1946年春节之际，中共代表团和民主党派在旧政协反对独裁专制，而国民党官报《武汉日报》《和平日报》《中华日报》提议，春节期间轮流编辑出“联合版”，以实行新闻封锁，限制《大刚报》单独发声。于是，“荃麟把重庆中共代表团进行斗争的内幕作了介绍，由报社写成了‘重庆专电’，正值《大刚报》轮值的那天刊出，并配合了由黎澍写的社论。这就使武汉乃至国统区广大人民知道了这场斗争，因那时国民党的中央社一条消息也未发”。

邵荃麟的夫人葛琴，直接主编《大刚报》副刊《大江》，组织一批党员作家，吸引一批进步青年，苦心经营出一个文艺阵地。它利用和谈期间的短暂良机，刊载茅盾、冯雪峰、邵荃麟、胡风、邹荻帆、绿原等人的作品，反对独裁专制，呼唤民主正义。邵荃麟、葛琴奉命转移后，《大江》由曾卓、端木蕻良、胡天风等接任主编，努力保持进步色彩。

董必武深知国民党发动内战在即，为《大刚报》分析时局，寄望“不要一下就把力量使光了，要准备长期艰苦的斗争，要保住《大刚报》这块阵地”。因此，在《大刚报》小小的编辑部，武汉地下工委、地下市委先后派出几拨地下党员“潜伏”。其中，主笔黎少岑是1927年的老党员，副总编辑黄邦和接受江汉军区城工部领导，编辑部主任欧阳柏与在香港的南方局文委渠道畅通。张英明、贾道恒、陶于斯三人组成党小组，先后由刘实、杜子才、朱康侯负责联系指导。1948年秋，武汉地下市委文化新闻小组成立后，又由曾卓、杨坤朝、徐绪铭、杨恩忠等人正式成立党支部，“准备长期艰苦的斗争”。

《大刚报》冒着白色恐怖危险，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起骨干作用，运用种种新闻手段，借用英美媒体的信息，揭露黑暗统治，传播黎明曙光，以至于“华中剿总”情报处直接威胁：“你们《大刚报》最近办得跟共产党的报纸差不多了，如果你们再这样办下去，那就干脆把你们送到共产党那边去好了。”

“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一心想将《大刚报》攥握手中，不准银行贷款提供流动资金、不准配售新闻纸张、不准上报摊售卖，一步步逼迫就范。白崇禧仓皇南逃前夕，也不忘给《大刚报》继任社长刘人熙送来飞往香港的机票和五百大洋，要他跟随到台湾去办报。

《大刚报》站在人民一边，迎来江城天亮。5月12日，秘密翻印8万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广大市民散发。5月16日上午，不等解放军部队进城，赶印数万份《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工商业政策》等文件，在报社门口公开散发。当天，特别套红印刷出《武汉解放》“号外”，刊登毛泽东、朱德的大幅照片——这在武汉报界乃破天荒之举。



《大刚报》1949年5月16日、5月17日一版

公私合营的重大转折

1949年8月8日，《武汉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新闻出版处关于同意〈大刚报〉登记的函》下达，准予发给汉口《大刚报》“新字第7号登记证”。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汉口《大刚报》与北京、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成为人民政府批准出版的4家民营报纸之一。

12月9日，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长江日报社社长熊复为汉口《大刚报》题词：“大刚报曾对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作过有益的贡献，因此，大刚报在解放后能获得人民政府的批准，继续出版。”

12月，中央新闻总署召开第一次全国报纸经理会议，指定汉口《大刚报》派员参加，总编辑严间天出席。副署长范长江对汉口《大刚报》十分了解，在大会总结中给予肯定和鼓励。

汉口《大刚报》公私合营时担任公方代表的陆天虹，后来在回忆《党对〈大刚报〉的改造》一文中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同《大刚报》在解放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报社多数工作人员的政治倾向是密切相关的。党对《大刚报》的历史和它的政治表现是有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的。”



《大刚报》继续出版，但原有的办报定位和版面布局，在宣传解释新

的政策方针、报道国民经济恢复等中心工作、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等方面，逐渐表现出不适应，发行量一度跌落到2000份，广告收入减少，工资借债发放，办公用房和印刷设备也十分落后，维持简单再生产已难以维继。

1950年8月12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由市政府出资扶持。

9月1日，《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隆重宣告成立。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之题词：“把武汉各阶层人民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成为建设新武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指导者。”谭政、李先念、赵毅敏、潘梓年、张平化、吴德峰等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领导人，也纷纷题词或撰文致贺，全部在当天报纸刊登出来，标示着汉口《大刚报》的重大转折。

《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由李尔重任董事长，刘人熙任社长，严闻天任副社长兼总编辑，陆天虹、曾卓、黄邦和任副总编辑。其中，陆天虹为公方代表人。

此前，陆天虹为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虽是城工系统地下工作者出身，却早在抗战时期办过报纸。1942年在苏北根据地编辑《江涛报》，1943年在苏南根据地主编《江南挺进报》，富有媒体从业经验。

《大刚报》公私合营后，三次面向社会招聘新人，23名大专和高中学生加入，带来生气。报纸经过改版，强化武汉地方报道，面貌一新。

中南《长江日报》给予《大刚报》大力指导，一方面社长熊复、总编辑陈楚来《大刚报》作报告，一方面邀请《大刚报》总编辑、副总编辑去《长江日报》参加编委会，听取传达上级有关精神，熟悉了解党报运行



2009年，陆天虹在家中

机制，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素养。在物资上，《长江日报》还转送保华街一栋三层楼房和一台轮印机，以缓解《大刚报》办公、印报的紧张状况。

《大刚报》培育发展成为一张党报的条件，一步步走向成熟。

市委机关报的奋力一跃

武汉解放初百废待兴，武汉市委迫切需要一张机关报指导工作、服务人民。

1952年1月1日，《新武汉报》创刊，《大刚报》完成历史使命，全体员工成为党报工作者。

《新武汉报》的报名之所以加之“新”字，为的是鲜明区别于历史上汪伪时期的《武汉报》和国民党时期的《武汉日报》，也象征解放后翻天覆地的新时代。它作为对开4版报纸，创刊号以12个版全新亮相，并在一版设立“人民的新武汉”专栏，每天刊登一幅图片，反映新时代的新气象，颇受读者欢迎。



1952年1月3日《新武汉报》一版

《新武汉报》创刊，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撰写发刊词——《祝新武汉报创刊》，明确指出：“《新武汉报》应当成为名符其实的党报”，“《新武汉报》的性质，应当是党性、群众性、地方性的有机结合”，明确指出办报定位。市长吴德峰也发表《迎接1952年，并祝新武汉报创刊》一文，热忱表达祝贺。

《新武汉报》由李尔重任社长，陆天虹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曾卓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由于《大刚报》原高层人士均为非党人士，并有加入国民党、国军等历史问题纠缠，在党报的组织架构中不便在高层任职，但给予正确对待和妥善安排。社长刘人熙作为“上层民主人士”对待，在家乡来人追究其曾参加地主武装的情况下，调任中苏友好协会武汉分会副秘书长，1955年任第一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副秘书长，一直连任到第六届。总编辑严问天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对待，担任总编室主任，1955年起任第一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副秘书长，一直连任到第六届任常委，并在1984年加入中共。副总编辑黄邦和作为“革命干部”对待，担

任总编室副主任，后调任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为我国拉美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对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经风霜的陆天虹，晚年回忆往事时特别强调：他们“没有受到如同报社党员干部所受到的那种打击和冲击”。

从1952年1月1日起，《新武汉报》告别交通路的狭小空间，迁到江汉路120号，5月31日再迁鄱阳街51号，办公环境大为改善。印刷厂新添轮转机，洞庭村新建职工宿舍，报社配置医务室等设施，职工积极性水涨船高。

1952年5月，李尔重因工作太忙，由李先念“点将”，调来襄阳地委宣传部长梁斌接任社长。10月，梁斌因创作长篇小说《红旗谱》调往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任党支部书记，陆天虹接任社长。

中南局考虑各省委、市委已经相继创办机关报，决定中南《长江日报》于1952年



1954年8月，长江日报社防汛功臣在鄱阳街51号留影，背后门廊上的挂牌已从“新武汉报”变为“长江日报”



长江日报社陈列室展板，第一排为李尔重（左二）、梁斌（左三）、陆天虹（左五），2006年作者留影

12月31日终刊，《新武汉报》从1953年1月1日起沿用《长江日报》报名，并兼有刊载中南局文件和评论的职能。同时，安排工业财经组副组长郭治澄等17人到武汉《长江日报》工作，郭治澄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由此，陆天虹既是汉口《大刚报》公方代表人、《新武汉报》第三任社长，又是武汉《长江日报》第一任社长，完整见证了汉口《大刚报》走向武汉《长江日报》的历程。

1954年11月1日，武汉《长江日报》迁入江汉路12号（洞庭街2号）兴华大厦中南《长江日报》社址办公，两张机关报的轨迹再度对接。

关于武汉《长江日报》同中南《长江日报》的关系，陆天虹在1994年《长江日报》创刊45周年时，撰写《〈长江日报〉前十年回顾》一文认为，武汉《长江日报》“是老《长江日报》的学习者和继承者，两者又有前后衔接的历史渊源，是一脉相承的。”

相比之下，南京《大刚报》绑上国民

党当局的战车误入歧途，最后陪唱挽歌一起走向穷途末路。1949年南京解放，南京《大刚报》百分之五十的官僚资本一经没收，便无法支撑而宣告停办。

1945年11月9日到1953年1月1日，汉口《大刚报》用7年多一点的时间，走向《新武汉报》《长江日报》的转型奋飞之路。2003年，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成立，拥有“十报一刊二网”，跻身于全国报业第一方阵。至今，更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传媒集团，以新型融合媒体集群扬帆远航。

参考文献：

- [1]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 [2] 唐惠虎、朱英主编：《武汉近代新闻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
- [3]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陆天虹文集》，武汉出版社，2001年。
- [4] 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 [5] 武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编：《往事如歌（卷三）——武汉老新闻工作者轶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
- [6] 长江日报报史编委会编：《长江日报五十年》（《武汉新闻史》丛书之一），武汉出版社，1999年。
- [7] 李洁龙编著：《汉口满街卖报声——旧中国武汉报业史稿》，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年。

罗建华，长江日报社高级编辑

承冯公亚佛遗风 做新时代的接力者

◇ 柴隽雯

人物名片：柴隽雯，民建湖北省委财经委副主任，民建武汉市委财经委副主任，武汉辛亥首义研究会副会长，江岸区政协委员。

(一)

我的外曾祖父冯亚佛，名镇东，字亚甫，湖北汉川军田咀人，生于1876年，卒于1962年，享年八十六岁。他幼年便开始学习举子业，二十二岁那年正值戊戌变法失败，西学东渐成为潮流，两湖地区新学之风盛行，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西方政治学说。

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心中愤懑不已，萌生了寻求救国真理的信念。1902年经过一番努力说服了父母，与同乡杨鸿藻、

蒋东佛结伴，负笈东渡日本，进了宏文学院学习政治。在日本，他结识了黄兴，从此投身到反清斗争中。

1905年，他参加了同盟会，并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前往南洋婆罗洲宣传革命。在那里，他与田桐一起创办《中兴日报》，并担任编辑，同时经营酿酒业，积极筹措经费支援革命。武昌起义后，他回到湖北任都督秘书。然而，袁世凯篡夺总统之位后，阴谋称帝，对革命党人充满仇视。外曾祖父被迫离职，转任河南汲县知事，后来又被财政部派充湖北府河口税局经理。1913年6月交卸职务时，他将所存的万余元全部资助讨袁行动。事情败露后，他被通缉，于是与蒋东佛化装成日本人，从武昌渡江至汉口租界，乘轮船前往上海，随后东渡日本，参加了孙



外曾祖父与外曾祖母在南京“证果园”小苑

中山先生改组的中华革命党，被派到南洋群岛办理党务。

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他随即回国。次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护法运动，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后，他担任秘书一职。孙中山先生曾写“天下为公”四字相赠。许崇智就任粤军总司令后，他被调任为司令部秘书长，当时蒋介石任参谋长。他看到蒋介石专横跋扈，许崇智受其掣肘，心中愤然，于是辞职改任福建仙游县知事。不久后，外曾祖父又回到广东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1926年，北伐军抵武汉，外曾祖父对中国的前途满怀信心，十分乐观。他曾赠给邱伯衡旅长一首七律：“短衣匹马粤东回，百战将军气不衰；半壁河山催鼓角，满腔忠愤郁风雷；鲁连岂许秦称帝，晋国犹夸德有材；今日一杯黄菊酒，明日重看岭头梅。”不久后，他回到湖北担任江汉宣抚使参赞，

与胡汉民、田桐等创办了《太平杂志》，共同探讨治国方略，决心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

他深感汉江平原水利失修，淹涝频繁，于是深入实地认真考察，著《改造湖北水利》一书，提出“襄河朝北”规划，主张将汉水干流引回故道；并利用华洋义赈会水灾救济款“以工代赈”，将汉川中州湖北面的大片荒地开垦为同兴垸（今新堰区永丰、同兴、东湖沟村一带），疏浚马港河，开凿曹家口，有效地减轻了天汉地区的渍涝灾害。

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不愿依附，而是隐居在南京的一座小苑，命名为证果园，醉心佛学，自号亚佛，还留有《证果园诗集》一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由南京迁居武昌，日寇进攻武汉时，他历经艰辛从浙江辗转至重庆。期间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志向，既不依附汪精卫，也不投靠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武昌，并于1946年当选为汉川县参议会议长。解放后，他被任命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又被公选为人民代表。特别是建国初期，他还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宣讲新中国的政策，呼吁在台湾的老朋友能够认清大势，为祖国统一出力。可以说，他这一生，从青年到暮年，心里装的始终是这个国家。

外曾祖父冯亚佛在青年时期东渡日本时，曾赋诗一首《辞家东渡》（家藏遗作），现摘录如下：

为学苦无成，负籍扶桑走。况兹国步艰，着鞭那可后。去岁请远游，未蒙父肯首。谓我无季昆，难离膝左右。今年父未归，私衷禀慈母。慈母闻儿言，贊许不绝口。道是男儿志，安用长株守。明朝辞母时，老泪已盈肘。送儿登行舟，停杖犹挥手。舟远望门闾，

湖云隐黄耆。但见林间鸟，飞绕湖边柳。言念三春晖，此心良负负。

(二)

外曾祖父冯亚佛先生以毕生心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是我前行的榜样，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作为第四代传人，我深知自己肩负的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家国情怀的传承。

2013年，我加入了民建；2021年，我有幸成为江岸区政协委员。这两重身份对我来说，是荣誉，更是实实在在的责任。我常想，怎么能将我在企业战略、人力资源和金融投资方面的相关经验，帮到会员企业，以及更多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怎么能把会员企业的力量凝聚起来，搭好企业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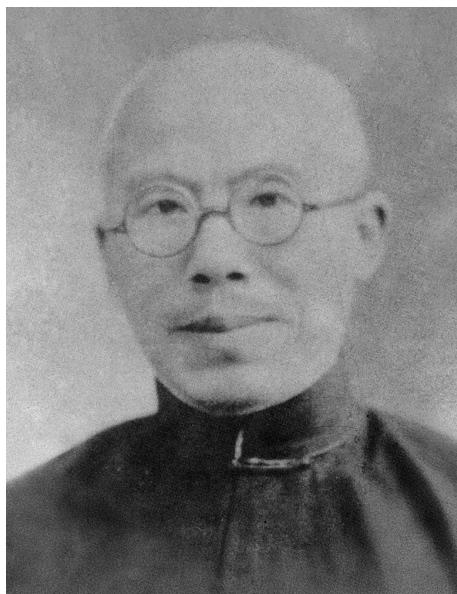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转。在民建武汉市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我做了一些尝试，比如，2014年4月20日，我发起并策划的“长江经济首届创新发展峰会暨两会商机创

新论坛”在武昌举行，200余名武汉商界、学界、政界代表集结于此，通过演讲、分享、对话等方式，探讨当前国家经济政策和创新发展商机等。

2015年5月18日，我发起并策划“第二届长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2015沪汉互联网+金融创新商机研讨会”，来自上海和武汉的近百位互联网及商界代表共议“互联网+”，共商创业创新趋势。中新网、新华网、新浪及人民日报海外网等7家媒体报道转发。

同年12月20日，我发起并策划“长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暨创新金融投资互助交流会”，会上就创新金融政策、创新金融助推湖北经济转型策略等相关专题项目展开探讨……看到自己策划的活动能搭建平台、促成交流，我亦感到十分欣慰。2018年，我当选为民建武汉市企业发展促进会第二届秘书长，更加坚定了我积极履职的信心。

民建作为和经济界联系紧密的参政党，围绕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是我们的本职。这些年，我陆续提交了差不多40篇社情民意和提案。其中，《关于在民营经济促进法案下，如何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助力经营质效提升的建议》被民建中央采纳；传承外曾祖父对湖北水利事业的毕生倾注，我提出的《关于对湖北省长江水资源保护的相关建议》被湖北省政协采纳。《关于对湖北省地方债金融风险防范的建议》《关于促进武汉市产业基金发展的建议》《关于提高武汉极端气象灾害下水资源保障能力的建议》等近30篇社情民意被湖北省民建、武汉市建及武汉市政协采纳；《关于优化江岸区营商环境，提升区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建议》《关于加强武汉市江岸区实施优质企业培育工程的建议》等12篇提案被江岸区政协采纳



外曾祖父冯亚佛



参加省政协“推进湖北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

并回复；《推动“文旅+三同”融合消费场景建设 打造湖北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新标杆的建议》，被省政协月度专题协商会书面采纳。每一次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每一次问题得到改善，那种成就感，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这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些履职的机会。

我也多次被评为省民建优秀会员、民建湖北省委社情民意优秀个人、民建武汉市委参政议政优秀个人；2024—2026年连续三年获聘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观察员等。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公益路上，我一直在努力前行，既帮助了别人，也收获了内心的欢愉。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少企业受到冲击，我就想，能不能发挥我们联系经济界的优势，做点实事帮大家复工复产？在江夏区行政审批局的支持下，我们推出了“江夏市民之家大讲堂”系列公益讲座。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到企业家心理调节，再到宏观经济分析、垃圾分类、大学生创业……我们请来全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导师，在网上免费开讲。

从2020年5月开播，累计做了20多期，直播受益观众已达到20万多人次。看到直播间里大家提问互动那么热烈，我觉得这件事做对了，值了。

平时，我也尽自己所能参与一些捐赠活动。2017年6月参与对鄂州吴伯浩小学建设与发展支持的爱心捐赠；2020年8月八一建军节前夕，通过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个人筹集的物资捐赠给荣军医院全体职工；2023年8月参与“对口帮扶恩施州鹤峰县扶贫助学”活动；2023年12月甘肃石积山县发生6.2级地震，我第一时间捐款捐物……力量虽然微薄，但也是一份心意。

我特别喜欢雷锋同志那句话：“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把自己融入集体、融入时代的事业中，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力量。站在今天，回望外曾祖父走过的风雨百年，再看自己脚下的路，我更加清楚了自己的方向。我愿意做新时代的一名接力者，以先辈的风骨为镜，把那份老辈传下来的家国情怀，化作今天凝聚共识的纽带、传递温暖的火种、贡献经济的智慧、推动进步的建议。这条路，我会继续脚踏实地走下去。

我与东腔戏的六十年守望

◇ 盛翠平（口述） 王高扬（整理）

鄂豫皖交界处的大别山，层峦叠嶂间藏着一脉穿越百年的文脉。罗田县白庙河村的晨雾里，总飘着一缕清越婉转的唱腔，这是东腔戏的雅韵，是山里人的精神图腾，更是我盛翠平——一位东腔戏艺人，用半生光阴守护的乡土精魄。

六十载岁月流转，我把自己的一生都揉进了东腔的戏文唱腔里，这门曾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在时代浪潮中逆势生长，成了大别山深处永不褪色的文化印记。而我的人生，恰如一出厚重的东腔大戏，唱尽了对这门艺术的坚守与传承，藏着一颗滚烫的初心。

戏台畔启蒙——戏魂早种少年心

东腔戏，亦称“东路花鼓戏”，它以高亢奔放的唱腔破山而出，用质朴生动的唱词



小时候的盛翠平

描摹人生百态，将山里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熔铸于丝弦锣鼓之间，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我与它的缘分，早在童年的戏台光影中便已注定。

1955年春，我出生在一个戏剧世家，父亲是当地戏班的核心艺人，戏班的流动戏台便是我的成长天地。五六岁的孩童，本应在田埂间追蝶嬉戏，我却总爱守在戏台侧



年轻时的盛翠平（左）

幕，看父辈们描眉画眼、披袍戴冠，听那穿透云霄的唱腔裹挟着山野清芬，在村落间久久回荡。锣鼓点起，我便踮着脚尖模仿台步；弦乐悠扬，我就跟着轻声哼唱。也许是天生带了戏缘，清亮的嗓音与过目不忘的记性，让我在耳濡目染间，悄悄承袭了这门艺术。

那时不懂戏文里的深意，只觉那唱腔能把心喊透。如今忆起往昔，眼前仍能浮现出旧时戏台的模样。几块木板拼凑的台面，搭在村头晒谷场或寺庙庭院，衬着蓝天白云，便是演绎世间百态的舞台。观众里三层外三层，有搬着竹椅的老者，有席地而坐的孩童，还有扛着锄头匆匆赶来的农人。戏文唱到动情处，台下掌声与啜泣声交织，戏与生活在这一刻无缝相融。这份鲜活的生命力，在我心里深深种下了对东腔戏的执念。

13岁那年，戏班一位饰演丫鬟的艺人突发疾病，演出在即，班主急得团团转。我攥着衣角，鼓起勇气站了出来：“我会唱，让我来！”那是我第一次登台，虽略带青涩，却凭着熟记的唱词与灵动的模仿，将丫鬟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台下雷鸣般的掌声砸在

心上，那一刻，我便认定，东腔戏就是我这辈子要坚守的事业，而父亲也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这门艺术的传承希望。

东腔戏的“唱、念、做、打”，没有捷径可走，每一项都需千锤百炼。为了练唱腔，我每天天不亮就跑到山间吊嗓，只为让嗓音更具穿透力；为了练台步，我在院子里铺上火纸，要求自己行走时纸页不扬，常常练得腿脚酸软、汗透衣衫；记戏文时，我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将繁复的剧情、晦涩的唱词烂熟于心，再反复揣摩角色心境，让唱念做打都贴合人物灵魂。

天赋加勤练，让我飞速成长。我不仅能驾驭生、旦、净、丑十余种角色，更能以声传情，用唱腔勾勒人物的悲欢离合。十几岁起，我便随父辈戏班跨鄂豫皖三省巡演：在安徽金寨的暴雨庙会中，戏服湿透仍唱得字正腔圆；在河南商城的节庆戏台前，灯火之下用表演点燃乡亲热情；在湖北罗田的山村堂屋里，用质朴戏文慰藉乡邻心灵。

那些年，我年均演出超百场，最长曾连续9天连唱27场。最后一场谢幕时，我体力不支瘫倒在后台，师父握着我冰凉的手叹道：“翠平啊，东腔戏唱的是山里人的魂，你这是把自己的魂也融进戏里了。”这句话，成了我一生的坚守。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无数戏台上演绎他人的故事，也用戏台丈量自己的人生。人生是大舞台，而舞台亦是我的人生。我在戏中成长，在剧中学做人，在唱腔里体验百态人生。

乡野间破局——为戏续命倾此生

时代浪潮滚滚向前，电视、网络的普及让传统戏曲渐受冷落。进入新世纪，东腔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老艺人们相继离世，年轻传承人寥寥无几，许多珍贵剧本与唱腔随着记忆消散，曾经火爆的戏班渐渐沉寂在岁月尘埃中。

彼时的我，有着一份安稳的工作，能维持体面生活。可每次看到东腔戏演出场次越来越少、学戏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寝食难安：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绝不能在我们这代断了根！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挣扎，我不顾家人朋友的劝说，毅然放下手头的工作，一头扎进了东腔戏的传承事业中。

面对家人的不解、旁人的质疑，我信念如磐：东腔戏是罗田的根，只要我还能唱，就不能让它消失。2004年，我倾尽毕生积蓄，自筹2万元成立了白庙河东腔戏曲团，决心



盛翠平参加演出时的合照

在乡野间为这门艺术寻觅生机。

创业的征途布满荆棘。没有排练场地，我便将自家堂屋清扫出来，摆上简单道具，让沉寂许久的锣鼓声在院落里重新回响；没有像样行头，我精打细算购置戏服、胡琴、锣鼓，每件道具都擦得锃亮，视若珍宝。没有足够演员，我就挨家挨户动员乡邻中的文艺爱好者，用一腔热忱打动了朱腊梅、祝桃林等骨干艺人，让他们放下农活，重拾戏服，与我一同坚守这份热爱。

剧本短缺是最大的难题，许多经典剧目仅存于老艺人的记忆中，没有一字半句的文字记载。我带着剧团成员，踏上了翻山越岭的抢救之路。我们走访散居在各村的高龄艺人，耐心倾听、仔细笔录，为了一句唱词、一个桥段，常常要往返几十里山路。有一次，为了抢救传统剧目《双揭榜》，我们找到了一位八旬老人。老人视力模糊、口齿不清，我们便伏在他膝前，逐字逐句地记录，白天采集、夜晚整理，足足耗时一个月，才将全剧完整复原。



盛翠平以前的戏班子

我深知，守艺不能墨守成规，创新方能让艺术永续。传统艺术要扎根时代，就必须与时俱进。于是，我带领剧团成员扎根乡村生活，创作了《东腔戏之防溺水》《喜迎二十大》等新剧目。这些作品以先进政策和农村现实为蓝本，唱词通俗易懂，唱腔却保留了东腔的精髓，既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又贴近观众审美，演出后广受乡亲们好评。

我们的剧团扎根乡野，服务乡邻，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的戏台。婚丧嫁娶的堂屋、丰收庆典的晒场、节日聚会的庭院，都成了我们演绎东腔的舞台。没有灯光，就挂起几盏白炽灯；没有观众席，乡亲们就围站在四周；哪怕台下只有几位老人，我们也一丝不苟地演唱。乡亲们常笑言：“东腔戏一响，连耕牛都竖耳朵！”这句质朴的赞誉，比任何荣誉都让我暖心，也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多年来，剧团年均演出 100 余场，足迹遍布罗田的山山水水。我们从乡村红白喜事唱到罗田民歌大赛，从《大别山放歌》的舞台唱到省级非遗展演，让东腔戏从深山走向省城，从濒危绝唱变成了罗田的文化金名片。年轻一代在戏文中读懂了乡土情怀，老一辈在熟悉的唱腔中找回了岁月记忆，这门古老艺术重新融入乡村烟火，激活了沉睡的乡土文化基因。

笔墨间传薪——愿为东腔留文脉

“我把肚内戏慢慢写出来，免得我带走了！”这是我写在剧本扉页上的誓言。我虽只有小学文化，识字不多，可心里清楚，文字记录是非遗传承的根基。如果这些戏文只藏在脑子里，总有一天会随着生命的消逝



盛翠平用的唢呐

而消散。2005 年起我下定决心，要将脑海中熟记的东腔戏剧本悉数默写整理，为这门艺术留下不朽的文献档案。

于我而言，将脑海中流转半生的戏文落于纸上，是一场比吊嗓练步更磨人的修行。我识字不多，遇上生僻繁杂的字词，便捧着字典逐字对照，一笔一划标注读音释义，常常翻得书页起了毛边；不懂标点规范，就揣着草稿本登门请教村里的老师，从逗号、句号的停顿，到引号、顿号的区别，问了一遍又一遍。凭着心底对戏的执念，将戏里的一颦一笑、一板一眼都原原本本地留存，不让半点精髓在笔墨间走失。

无数个深夜，当乡野陷入沉寂，我屋里的灯还亮着。我伏在案前，握笔的手因常年劳作和书写结满了老茧，却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白天汇演结束，再累也要立刻整理剧本；农忙时节，做完农活就接着默书；演出途中想起遗漏的唱词，就在后台换妆的间隙，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下，生怕灵感转瞬即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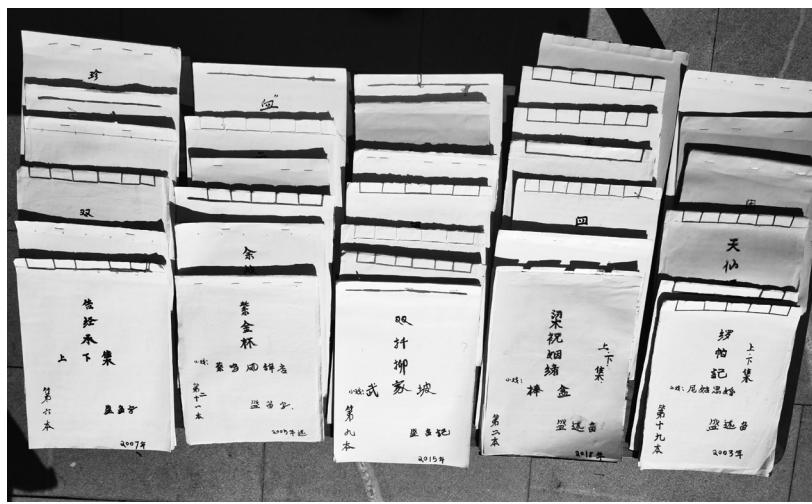
整理过程波折不断。有些剧目年代久远，细节记忆模糊，我就反复琢磨，再结合老艺人的口述补充完善；有些唱词满是方

言，难以用书面语准确表达，我就在旁边标注方言含义，尽力保留东腔的原汁原味。为了还原《荞麦记》的核心唱段，我茶饭不思好几天，某天夜里做梦，竟把完整唱词都想了起来。顾不上深夜的寒凉，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写，生怕这珍贵的记忆再跑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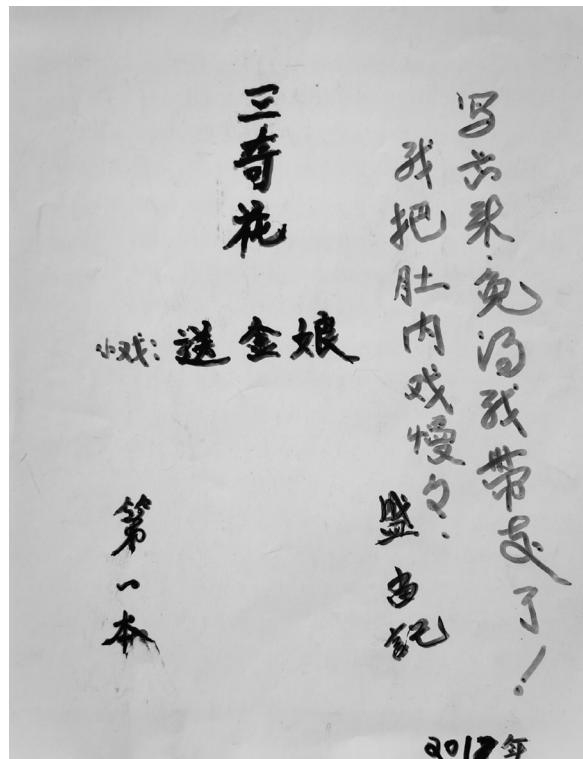
寒来暑往，岁序更迭，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写满了22个厚厚的本子，累计百万余字，成功整理出48部大戏、74部小戏。这些剧本涵盖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生活百态，成了研究东腔戏的珍贵资料。我的目标，是用余生完成140部戏的抢救性留存，让东腔戏的根脉以文字形式永久传承下去，哪怕我不在了，后人也能循着这些文字，再唱起这门古老的戏剧。

非遗传承的关键在人，只有让年轻人爱上东腔戏，这门艺术才能真正活起来、传下去。2013年，在我的奔走推动下，东腔戏正式入驻白庙河中小学课堂，成为校本特色实践课程。从此，每周都能看到我蹒跚的身影行走在山间小路上。我家离学校有好几里山路，步行要一个小时，无论春夏秋冬、农忙农闲，我从未缺过一节课。

有一次下暴雨，为了赶上课时间，我



盛翠平默写的部分东腔戏唱词



盛翠平在扉页上写“我把肚内戏慢慢写出来，免得我带走了”

抄近路走陡峭的山坡，不小心摔进了山沟，身上多处擦伤，脚踝也肿的老高。在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后，我跛着脚赶到了学校，坚持把课上完。

在课堂上，我不再是戏台上的演员，而是孩子们的“盛先生”。我从基础唱腔、台步教起，带他们认识胡琴、锣鼓等戏曲乐器，给他们讲戏文里忠孝节义、善恶美丑的文化故事。为了让孩子更容易接受，我把复杂的戏曲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语言，把枯燥的基本功训练融入游戏之中。12年间，我累计授课超700课时，培养了400余名学生，把传统美德通过戏文，一点点传递给了下一代。

如今，在学校的课间操、文艺汇演上，总能听到孩子们稚嫩的东腔唱腔，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我收徒弟也从不挑拣，只要有人愿意学、真心爱这门艺术，我就倾囊相授，誓要让“老艺人的技艺不断根”成为现实。

山水间相守——此生命系东腔魂

如今我已经七十岁了，岁月在脸上刻满了皱纹，可只要锣鼓声一响，披袍登台，我的唱腔依旧清亮高亢，台步依旧稳健有力。对东腔戏的这份热爱，早已融进了我的骨血里，在眉眼间熠熠生辉。

这些年，荣誉纷至沓来：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一等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冈好人”……可在我心里，这些都比不上东腔戏能一代代唱下去重要。我不在乎名利，只愿东腔戏能被更多人知道，这是我们罗田的乡土之魂啊！

在我的努力下，东腔戏也迎来了发展新机。罗田县委、县政府加大了扶持力度，为剧团提供了更好的演出条件与资金支持；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加入传承队伍，为这门古老艺术注入新鲜血液；东腔戏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文化之花在大别山遍地绽放。

可我不敢停歇，也不能停歇。我还在整理那些没写完的剧本，还在坚持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还在带着剧团编排新剧目，还在



东腔戏进校园的节目展演

四处奔走参加各类非遗展演。我要把东腔文化传承下去，不让它随我入土。这是我对乡土、对东腔最庄严的承诺，是我这个老艺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东腔戏的戏声还在山间回荡，我的传承之路也还在继续。我相信，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守护下，这颗大别山深处的文化明珠，必将在时光长河中愈发璀璨，恒久回荡于鄂豫皖边境的山水之间，成为永不褪色的文化丰碑。而我能与东腔相伴一生，足矣。

王高扬，罗田县白庙河镇人民政府党建办副主任；盛翠平，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腔戏代表性传承人

此身系乡土，此心传大爱

◇ 魏剑英（口述） 梅慧香（整理）

人物名片：魏剑英，新洲区政协委员，新洲区汪集街魏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武汉剑鑫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董事长，荣获“中国好人”“荆楚楷模”称号。

一个人活着的价值，不在于身后留下多少财产，而在于能为这个社会、为身边的人带来什么。从食不果腹的穷小子，到村党支部书记和区政协委员，我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离不开土地的滋养和乡亲们的信任，是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造就了今天的我。

用知识改写人生

我出生在魏咀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野菜、糠饼是家常便饭，饥饿更是童年最深

刻的记忆。最心酸的是爷爷，他心疼几个孙儿营养不良，时常去田里抓田鼠煮肉给我们打牙祭。但他去世时，家里穷得连置办棺材的木料都买不起，最后只能拆下大门，为他勉强做成了一口棺材。那之后好几个月，我们家没有大门，风雨无阻，仿佛在诉说这个家庭的艰难。

十四岁那年，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我不得不辍学，跟着同乡到青山区一个建筑工地，干最辛苦的拎灰桶工作。一天下来，浑身是泥，腰酸背痛，只能挣到一块八毛三。那时，我最羡慕的是工地上那些能看懂图纸、指挥若定的施工员，他们在我眼里，就是有知识、有本事的人。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向一位施工员请教，想跟他学看图纸。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嘴角一撇，嘲讽道：“你一个拎灰的，还想当施工员？下辈子吧！”



魏剑英（左）在魏咀村

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可我不信命，更不信什么下辈子。人穷不能志短，我毅然辞掉了工地的工作，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合伙养鱼。1988年特大龙卷风袭击新洲，我正在渔棚里值班，深夜十一时，龙卷风将渔棚抛向空中，我摔得昏死过去。龙卷风带来了极端天气，十月的武汉竟然下起大雪，我在雪地里昏睡了半夜，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送医院时，心跳都没有了，经医生的全力救治，才大难不死。这次死里逃生，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通过自己的努力，两年半后我攒下了六千多块钱，在上世纪80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怀揣着这笔希望之款，我跑到汉口报名参加成人夜校，可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个玩笑，报名时学费竟还差三十五块钱。

站在陌生的教室里，看着周围可能比我年纪还小的同学们，我脸涨得通红，但心里不想放弃。我提高嗓门对大家说：“同学们，今天我魏剑英遇到了一点小困难，哪位同学肯借我35元钱？三年后，我必还他350元！”

教室里先是寂静，随后，一位老乡被我的真诚打动，帮我垫上了这救命的三十五块钱。那一刻，我眼眶湿热，心想这辈子绝不会辜负任何一份善意，有能力时，定要千倍百倍地回报社会。

从此，我白天在工地拼命干活，晚上风雨无阻地去夜校上课。知识像一盏灯，一点点照亮我前行的路。三年后，我拿到了施工员证，命运的门终于被我用汗水和坚持撬开了一条缝。凭着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积累的经验和人脉，我开始承接项目，创办自己的公司。

创业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曾投资失败，负债累累。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个在雪地里死里逃生的夜晚，想起那位借我三十五块钱的老乡。正是这些经历磨砺出的坚韧，让我一次次从泥潭中重新站起。

让乡土焕发生机

2014年，我们村“两委”换届，乡亲们一致推选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那时，我的几家公司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村里的事也是纷繁复杂，家人和朋友都劝阻我：何必回去挑那副重担？

我走在村里的土路上，看到那些破败的房屋，面对乡亲们期盼的眼神，想起小时候左邻右舍给我家送来的那一碗米、一把菜。我意识到自己的根在这里、情在这里，最终下定决心，把公司交给亲人打理，义无反顾地回到魏咀村。

上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访，全



新洲区大爱人生公益协会

村 33 户贫困户、54 人，我一家一家地走，一户一户地聊。听他们讲生活的难处，有的是因病致贫，家徒四壁；有的是缺乏劳动力，生活无着落；有的是想发展产业，却没有本钱和技术。

村民魏九敏患癌症去世后，家里连安葬的钱都拿不出来。我带头捐款，并借给他家 5000 元办理后事。五年后，他家经济条件稍有好转，就把这笔钱还给了我。乡亲们的纯朴和诚信，更坚定了我要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决心。

精准帮扶，关键在“精准”，村“两委”班子提出“应急资助、规划管总、兴业治根”三措并举的思路。首先，要改变村容村貌，提振大家的精气神。我自掏腰包一百多万元，带领村民硬化村湾道路，建设“四好”公路，安装 173 盏路灯，让全村 13 个湾组夜晚都亮堂堂的。我们还清理六千多米的沟渠，打通了困扰村民多年的三处“半截子路”。路通了，灯亮了，村民的心也亮了。

随后，我们指导成立了文渊博养殖合作社，现在年收入超过百万元；还推进尚爱人生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组织 133 户农户土地入股，解决了土地闲置问题。我们开发了蔬菜、养殖、林果、种植四大产业园，把 11

户精准扶贫对象安排到产业园就业，带动 4 户通过产业增收。看到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脸上洋溢出自信的笑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我一直都坚信，经济扶贫是治标，教育扶贫才是治本。村里规定，孩子考上省级示范高中，奖励一千元；考上一本院校，奖励三千元。所有贫困家庭孩子的学费，由我个人给予资助，直到他们完成学业。截至目前，我已资助了 1700 多人次的学生。每次把学费交到孩子们手上，我都会对他们说，这钱不用还，等他们哪天有能力了，希望也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如今，这份爱心已经传递到了第六代受助学生，形成了一条温暖的“生态链”。

到 2018 年底，我们魏咀村 33 户 54 人全部提前脱贫。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村容美、产业兴、民风淳的示范村。

让善行生生不息

经历过几次生死考验，我对生命的脆弱与珍贵有着更深的体会。1988 年遇到特大龙卷风死里逃生；2004 年，我又被查出先天性肾囊肿和肾积水，肾功能濒临坏死，前后做了九次手术，历时十年治疗。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我彻底想明白了：生命无常、稍纵即逝。活着，就要做有意义的事，就要把爱和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从此以后，慈善成了我毕生的事业。从 2004 年起，我累计为乡村建设、贫困家庭和重病学生捐款超过 600 万元。但我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汇聚更多人的爱

心，才能形成温暖的江海。2017年，我发起成立了“新洲区大爱人生公益协会”。

最初，我们去福利院服务，只有包饺子、理发、剪指甲等几个简单项目。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服务项目也扩展到做卫生、送医送药、文艺表演等16项。看到我们的志愿者们，有些甚至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学着给老人洗头、剪指甲，老人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我觉得这就是慈善最大的价值。

2023年10月的一天，我骑电动车经过邾城龙腾大街路口，看到一名女子晕倒在斑马线上，脸色发青。我立刻停车冲过去，一摸鼻息，呼吸已经没了，但脉搏还在跳动！我脑子里立刻闪过“黄金四分钟”。当时，我腰里因为手术植入的两块钢板还没取出，医生严禁我久跪和剧烈运动。但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有一个念头：救人！

我跪在地上，一遍遍地给她做心肺复苏，汗水湿透了衣服。经过几分钟的抢救，她终于喷出一口泡沫痰，慢慢恢复了意识。直到救护车和民警赶到，我才扶着几乎直不起来的腰，悄悄离开。后来，我把这个经历搬进了儿童安全课堂，用亲身经历教孩子们“如何防、如何救”。我希望，这瞬间的善举能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守护生命的力量。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我想，是源于我父母的言传身教。我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为人正直，他常对我说：“哪个爹爹婆婆家里没水了，去帮他们挑一担。”我八岁时就开始帮村里的老人挑水。母亲七十岁大寿那天，我因为去福利院看望老人迟到了，她非但没有怪我，还乐呵呵地说：

“孝敬别的老人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

如今，我获得的荣誉不少，“中国好



慰问福利院老人

人”“荆楚楷模”等等。但始终记得，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政协委员，这些荣誉是鞭策，更是责任。未来，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建一所公益养老院，专门收留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人、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由我出钱建，让他们免费住，不能让付出爱心的人寒心，不能让善良的人老无所依。

我从泥土中走来，最终又回到泥土中去，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努力把“履职为民”这四个字，融入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授课、每一次公益行动中。我用实干回报乡亲的信任，用爱心温暖脚下的土地。

我坚信，爱是可以传递的，善是能够接力的。只要心中装着人民，肩上扛起担当，脚下沾满泥土，我们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不平凡的人生篇章，汇聚起推动社会向前、向善的磅礴力量。

董必武在汉口安仁里

◇ 何裕生 陈义 张海龙

1937年秋，抗战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八路军在武汉设立办事处，中共中央委派51岁的董必武重返武汉，出任中共中央的代表。

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在家乡拥有得天独厚的人脉根基——从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开明派、进步知识分子到地方士绅，接触广泛又享有崇高威望。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党内公认的元老，董必武肩负此任，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对武汉工作的高度重视。

董必武儒雅、沉稳、坚韧，具有长者风范与人格魅力。在国共合作初期敏感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既能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又善于灵活应变，长于与各方人士沟通交流，是弥合分歧、建立互信的最佳人



董必武

选。他的行事风格，更易于被国民党开明派和社会中间力量接纳；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而经历丰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精

通法律而思维缜密，善于处理复杂的具体事务——这些特质的完美融合，正是应对日常摩擦、开展合法斗争所迫切需要的，使他成为进驻武汉开展统战工作的不二人选。

六渡桥安仁里的煤油灯光

1937年9月，董必武从延安抵达武汉，着手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0月底，办事处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今汉口民意一路）1号正式成立。

安仁里1号位于汉口最繁华地段六渡桥，典型石库门建筑。房东阮毓崧的身份颇为特殊，既是清末湖北谘议局议员、民国国会众议员，又是潜心研究《庄子》的学者，更是一位投资民族工业的开明士绅，还是董必武的黄安老乡。正是这份深厚的同乡之谊和他本人的开明思想，为中共在武汉的活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掩护。

10月，办事处在安仁里2号正式挂牌，陈设简陋，仅有几张桌椅一部电话，却在董必武的领导下，迅速高效地运转起来。他的学生聂菊荪后来动情地回忆：“先生总是工作到深夜，他的煤油灯一亮，我们便知道他又在伏案批阅文件或挥毫撰写文章了。”



安仁里现状

当时，董必武应武汉大学地下党外围组织——抗日问题研究会的邀请，为全校师生作题为《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讲演。他积极宣传中共关于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热情鼓励师生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这篇充满激情的演讲稿，正是诞生于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下。

与董必武比邻而居的报人蔡寄鸥由衷感慨：“他虽是五十多岁的人，每天奔走忙，写作忙，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他的做事精神，的确够人佩服。”这座隐藏在闹市的石库门房子，就这样成为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联络中枢。

重建党组织的战略布局

董必武抵达武汉后，立即投身一项关乎全局的重要任务——参与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恢复和发展华中地区党组织。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不言而喻：经过十年内战的严酷考验，华中地区的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亟需重建以适应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

湖北本是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然而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间，除鄂东北等少数几个坚持武装斗争的地区外，党组织几



乎损失殆尽。

董必武着手恢复与壮大党组织，重点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工作：

一是全力营救被国民党长期关押的共产党员。他不辞辛劳，亲自前往国民党武汉行营和湖北省监狱进行交涉，凭借坚韧的意志与智慧，成功使原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华岗、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等一批有重要影响的负责人重获自由，回到革命战线。

二是积极联络因组织遭破坏而失散的共产党员。他细致寻访那些在失去组织关系后仍坚守信仰、坚持革命的志士，把他们重新凝聚到党的旗帜之下，为党组织聚集了宝贵的有生力量。

三是着力整顿与巩固尚存的党组织。面对严峻的斗争环境，他系统梳理现有组织架构，强化纪律建设，增强组织活力，使各地党组织在复杂形势下能有效运转、发挥作用。

董必武到武汉不久，党中央即派郭述申等人回湖北工作。在董必武的指导和关怀下，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很快成立，并于1937年12月改组为湖北省临时委员会。

鄂东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得到了董必武的直接指导和热切关怀。1937年11月末，参加过黄梅苏区工作的桂林栖，受董必武派遣，从武汉返回黄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同在11月末，年轻姑娘鲍有荪、傅承铭冒着战火危险，从舒城风尘仆仆来到安仁里寻找党组织。董必武听完汇报，语气坚定地指示：“你们返回舒城后，要重点开展三项工作：一是积极发展党组织；二是着手建立抗日武装；三是切实做好统战和救亡工作。”

此后，在董必武的直接指导下，湖北省委很快在应城汤池、黄安七里坪等地举办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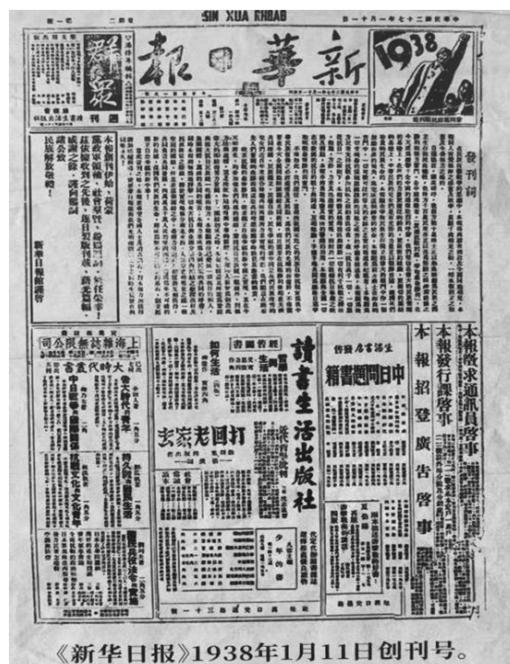
部训练班。其中，由李范一提供支持、共产党人陶铸实际负责的汤池训练班，在短短数月内为敌后抗战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发挥《新华日报》的“嘴巴”作用

在安仁里那盏不灭的煤油灯下，董必武还为《新华日报》的创办倾注了大量心血。1938年1月11日，这份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中共机关报，终于在汉口正式创刊。董必武不仅是报纸筹备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更在创刊后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创刊前夕，董必武代表长江局在报馆全体职工大会上鲜明地指出：“《新华日报》是党的嘴巴。”这句话简洁而有力地阐明了党报的政治立场和使命担当。

然而创刊不到10天，1月17日晚，一伙受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暴徒，悍然捣毁了报馆印刷厂。面对公然挑衅，董必武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韬略。他立即组织连夜抢修，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号。

《新华日报》创刊号



新华日报社大陆里旧址

确保报纸第二天照常出版。在这期来之不易的报纸上，刊登了他写下的铿锵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2月12日，董必武在《新华日报》发表题词强调：“文化是民族生命中一种不可磨灭的力量……保卫文化，不仅是文化界同仁的任务，同时也是全体同胞的任务。”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彰显出共产党人对文化抗战的深刻认识。在他的支持下，武汉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文艺高潮，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艺运动的重要阵地。

董必武为《新华日报》撰写了多篇文章。3月12日，发表《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借纪念孙中山先生表达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6月28日，发表《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系统阐述动员民众、改革政治的主张。

开展统战工作的远见胸怀

在武汉暗流汹涌的政治漩涡中，董必武展现出建设统一战线的非凡智慧。他深知，

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必须凝聚最广泛的人心，筑起最坚固的堡垒。

董必武展现出卓越的统战艺术，既有高屋建瓴的战略视野，也充满洞悉人性的细腻笔触。对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地方士绅乃至昔日的对手，他始终秉持“求同存异、团结抗战”原则。他经常对身边同志说，“我们要善于团结那些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的人，哪怕他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今天的形势变了，我们的胸怀也要变。”

董必武与陶钧的会面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当那个在大革命时期坚决反共的桂系将领到访时，他与之促膝长谈，让不明就里的旁观者大为惊愕。因为十年前，正是这位陶钧率部四处追剿董必武等共产党人。

“十年前他要杀您，如果那时捉住了您，他是不会和您促膝谈心的。”面对友人的质疑，董必武恳切而坚定地解释道：“现在党中央的统战政策，是联合一致抗日。共产党人只求有利于党，有利于革命，如今民族危亡，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就是要凝聚所有抗日力量。怎么可以计较个人的恩怨，也没有所谓个人的恩怨。”

这番话，道出的正是董必武从事统战工作的核心精神——以民族大义超越个人恩怨，以革命原则驾驭复杂局势。他不仅这样说，更是身体力行。无论是拜访辛亥元老，还是与武汉工商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恳谈，他总是以诚相待，分析时局，阐明中共抗日主张的真诚与决心。他那儒雅谦和的风度、言之有物的谈吐，以及无可挑剔的个人操守，使得许多原本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人

士逐渐转变看法，开始理解并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湖北三怪”石瑛、严重、张难先的转变颇具代表性。这三位在湖北政坛以清廉耿直著称的元老，最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1937年深秋，张难先冒雨来访，看见董必武正在灯下缝补旧棉袍，不禁愕然：“必武兄贵为中共代表，何以清苦至此？”董必武淡然一笑：“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尚不得温饱；延安同志吃小米住窑洞，甘之如饴。我今有此避雨之所，已属过分，何敢言苦？”让张难先深受触动。

更深的革命情谊体现在董必武与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交往中。李汉俊是董必武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引路人。1919年，董必武在上海结识李汉俊，正是通过他的介绍，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董必武曾深情回忆：“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共一大就是在李汉俊兄长李书城的上海寓所召开的。这段深厚的历史渊源，使董必武在武汉时期能够继续得到李书城等民主人士的坚定支持。

董必武以人格魅力与政治襟怀，成功地将党的政策转化为浸润人心的温暖力量，在看似铁板一块的国统区，巧妙地打开了局面，为党赢得了更多的理解、支持与生存空间。许多关键人物为八路军办事处提供宝贵的帮助，在舆论上为团结抗日发声。

历史回响的铭记与启示

随着抗战形势的快速发展，安仁里已无法满足日益繁重的工作需要。1937年12月初，办事处迁至原日租界中街89号（今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



安仁里1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但安仁里并未退出历史舞台。2号院转为办事处招待所和秘密据点，继续发挥特殊作用。1938年6月，湖北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董必武住处召开，会议作出恢复和发展全省党组织的重要决定。这一时期，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曾在此暂居，亲自感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董必武作为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告别了安仁里。

80多个春秋过去了，安仁里的石库门依然伫立在汉口闹市。当我们漫步在民意街道，追寻这段红色记忆时，不禁陷入深思：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从来就不在于办公楼的宏伟、物资的充裕，而在于与人民群众紧紧相连、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

今日安仁里，属于武汉市江汉区民意街道辖区。从“安仁”到“民意”，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的变迁，更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升华。它告诉我们：伟大，往往就藏在平凡的坚守中；光明，常常从最朴素的心灵里升起。

何裕生，武汉市江汉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义，武汉市江汉区人大代表、武汉云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海龙，作家、编剧

富源里：抗战初期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所在地

◇ 田联申

全民抗战初期，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于1937年10月成立，12月改为湖北省临时委员会。1938年6月，省临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湖北省委。中央选派熟悉湖北、武汉情况的孝感人郭述申任省委书记、咸宁人钱瑛任组织部长，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救亡图存。

湖北省委的办公地点，设在汉口府东一路（今前进一路）富源里。1938年10月25日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委撤退至鄂西。

湖北省委发动群众抗战

郭述申，孝感县城关镇人。1904年出生，1916年随父亲到武昌，入私立勺庭中学读书，取名郭树勋，号耀珊。1918—1921年，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1922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冬，



郭述申在富源里

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国民革命活动。土地革命时期，历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红25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兼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政委等职。

1937年9月22日，郭述申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此时武汉八办设在府前街（今民主一街）安仁里2号，董必武向郭述申交代任务，一面熟悉湖北情况，一面着手党组织建设。为工作方便，郭述申化名李震寰。

10月上旬，博古传达党中央决定，成立湖北省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陶铸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钱瑛任组织部长。省工委的主要工作是重建和发展党组织，培训干部，开展群众运动，加强统战工作。随后，省工委在黄安七里坪举办两期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和两期抗日青年训练班，训练600余人。

12月25日，根据长江局指示，省工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党的工作中心是围绕保卫武汉这个中心任务开展群众工作，继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准备在湖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会上成立湖北省临时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

1938年1—5月，省临委抓紧发展党的组织，全省党员由30名发展到1040名，建立武昌、汉阳、汉口三个区委。5月1日，省临委组织武汉各业工会及劳工团体的8万余人，隆重举行“五一”纪念大会。上旬，在富源里举办4期党员训练班，共培训134名党员；举办短期训练班，培训平津流亡学生和失业青年。

6月，省临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湖北省委，郭述申任书记。会议决定在继续加强城市工作的同时，积极开辟



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参加游行，前排右二为董必武，原载《新华日报》1938年9月10日

农村工作，疏通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形式组织文艺界人士、革命青年组成战地服务团、抗敌宣传队等深入到全省农村。在全省相继建立鄂东、鄂中、鄂南三个特委，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9月1日，省委党员短期训练班开学，训练新党员和支委、小组长以上党员，共举办3期（见《郭述申年谱及著述补遗》）。

9月9日，武汉在上海大戏院（中原电影院）举行“武汉各界拥护国联援华制日运动大会”，武汉五万民众游行，省工委参加游行，第一次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的旗帜，并致电国联大会（载1938年9月10日《新华日报》二、三版）。郭述申以省委负责人身份露面。

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公鉴：

自日本军阀，不顾国际公法，世界正义，武力侵略我国以来，轰炸不设防城市，施放毒瓦斯，至于奸淫、掳掠、焚烧、屠戮种种兽性暴行，惨不忍述。凶残日阀，不仅为中华民族之仇雠，亦且为文明世界之公敌。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十四月之抗战，固为我民

族之生存与独立，而给侵略者以打击，亦所以支持世界之和平。兹当贵会开会时期，恳请大会迅速援用盟约第十七条，对侵略者的日寇，予以有力的集体制裁，使中国抗战能早日获得彻底的胜利，不胜企望之至！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九月九日

这是迄今为止历史留下的湖北省委公开活动的唯一记录。

省委机关设在富源里

1978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郭述申《悼念钱瑛同志》诗二首，其一回忆“董老家中商大计，富源楼上听高谈”，并注明“汉口富源里系当时省委一个秘密机关”。

这个“董老家”，应是与富源里一侧同在府南一路（今民主一街）的安仁里，此时董必武借住在黄安（今红安）老乡阮毓崧所建的安仁里1号楼上，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安仁里2号（后迁至今长春街57号）。富源里则是湖北省委机关办公、开会的地方，工作人员的宿舍也在那里。

作家马识途（1915—2024）一生难忘富源里，多次讲述在富源里入党经过：1938年夏的一天下午，23岁的马识途携湖北省委副书记陶铸写的介绍信，在富源里省委机关见到组织部长钱瑛，钱瑛看了介绍信，亲切地对他说：“哦，你就是马千木。一切明天再说，今晚你就住在这里，不过是打地铺哟！”第二天早上，钱瑛拿出一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他填写后郑重其事地签上马识途。钱瑛看后不解：“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马识途回答：“从入党的这天起，我改名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钱瑛大笑，在介绍人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在上级批准人一栏签

上“组织部部长钱瑛”。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马识途的不多，1960年代《武汉晚报》曾连载他的小说《清江壮歌》，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马识途在湖北从事地下工作时，与妻子刘惠馨生有一个女儿。刘惠馨被捕后，小女孩由同富源里一条街（民主一街）的维善里邮电工人王素珍收养。1960年代马识途找回了女儿，一时传为佳话。1964年秋，笔者在双洞门中学读初二，学校组织到武汉粮食学校听王素珍作报告，内容就是讲述收养经过。

韦君宜回忆《在钱大姐身边成长》，湖北省委机关在富源里的门牌号码她都记得：1938年夏天，我又被调回武汉。这次是住富源里2号省委机关了，工作是搞民先队。那里还住着好几位老资格大姐，也有和我差不多的“小字号”，小梁、小陈等等一群。

济生公司与富源里

1950年代，我家住在民意一路大陆里，时常路过富源里，部队驻地，巷子口有持枪的士兵站岗，披着神秘的面纱。

据《武汉地名志》载：富源里1920年由富源砖瓦公司建房成里，故称富源里。1967年并入前进一路，1972年复名富源里。

湖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昌庆旭对砖瓦颇有研究，他告诉我确实有富源砖瓦厂，并发来有富源机器砖瓦厂生产的铭文瓦照片。但就此认定富源里为汉阳富源机器砖瓦厂所建，武汉文史研究者一直有不同看法，主张“为富源煤矿所建”，却苦于没有资料证实。

没想到，2021年4月9日《黄石日报》报道《在汉口，黄石有块“红色飞地”》，颇引人注目：在汉口六渡桥前进一路，唯一



1935年，煤矿工程师陈贤瑞在富源煤矿口（陈良渠供图）



武昌红巷江城印象博物馆保存的富源公司地界碑

以黄石市历史上一家著名企业富源煤矿名称命名的里弄“富源里”就要被拆除。一名七旬的黄石老人却坐不住了，这究竟是为何？老人名叫陈良渠，是湖北理工学院矿冶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富源里不仅是黄石近代工业发展的里程碑，还对黄石传承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富源里是黄石人民与武汉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当时，富源煤矿公司总部在汉口、生产厂矿在黄石，公司负责人大多数是武汉著名的实业家，近、现代武汉民用煤大多由黄石富源煤矿等煤炭企业供应。后来因富源煤矿经济效益良好，便将资金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加大产业规模；一部分用于投资，在武汉六渡桥地段附近购置近十亩地皮，随即建造了富源里。

据《湖北黄石煤炭史》载：民国十三年（1924），富源煤正式进入武汉市场。此时正值军阀混战及北伐战争前夕，南北交通常受阻滞，武汉煤市供不应求。富源以地临江边得天独厚，吨成本常在五元上下，运费尤

为低廉；而汉市煤价，有时每吨高达十八元以上；且因市场紧俏，“照例先付定金随后依次发煤，公司常收定金三四十万元”，资金充裕，每年纯益均在十万元以上。从民国十四年（1925）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汉口买下了济生公司地基一段，合计面积624方丈83方尺，计白银93783两，以本矿之名建成“富源里”一弄，计铺面房屋52栋，里内住房27栋，共计79栋，于民国十七年（1928）建成，连同

地皮，共计用白银20.88万两。（见《富源公司民国二十五年支四柱清册》局档003）

总部设在汉口的富源煤矿公司，不仅是湖北最大的煤矿，也是黄石地区经济效益最好的龙头企业。1936年，富源煤矿与富华煤矿合并，成立大冶源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1920年代，汉口商贸发达，后城马路开通，在后城马路与京汉铁路之间，商居两用的里份建筑出现兴建高潮，吸引众多投资者。

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军人在民国初期封为将军，享有荣誉及俸禄。唐春鹏、汤芗铭、石星川、孙武、邓玉麟、熊祥生、陈士可、吴兆麟、蔡汉卿、杨缵绪等人常在一起活动，称为“将军团”。李华堂、李春萱、黎澍、刘祥茂、吕超伯等政商界人士也参与其中，常在一起聚会娱乐交流信息，热衷于房地产开发。

1921年8月，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后主张“鄂人治鄂”，石星川、李春萱、傅楚材、

蔡汉卿、吕超伯等组织济生公司，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拿到“地皮大王”刘歆生的抵押土地，从事房地产开发。在围绕汉口市政府（市府路，今民主街）的“市府区”，兴建许多可与租界里份媲美的里份，如蔡汉卿的希昌里（今大陆里《新华日报》旧址所在地）、汤芗铭的多闻里、李春萱的大成里及沔阳中学，还有王占元、刘佐龙、杜锡钧等人的八元里、鸿钧里、衡云里，富源煤矿公司的富源里。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结识了辛亥革命后裔李良丽女士，披露了她爷爷李春萱（李作栋，武昌首义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长）发起创办济生公司及经营的情况，家中保存的资料系李春萱1949年带到并保存在香港，1980年代由亲属带回武汉。从济生公司简章中可以看到，济生公司专以买卖东方汇理银行有抵押权之济生堂左近地皮，四万零七百余方为营业范围。

武汉地方历史常提到的“燕马湖地皮”，当是济生公司简章中的“济生堂左近地皮”。1926年《武汉三镇详图》显示，今“民意街”与“前进街”辖区有一狭长的湖塘称为燕马湖，今靠近京汉大道处遗有地名燕马巷。

富源煤矿是从济生公司购买的地块，就在“济生堂左近”“六渡桥地段”，购买了其中的624方丈83方尺近7000平方米，比《武汉地名志》上记载的富源里5200平方米的范围要大。这可能是《武汉地名志》只记载了里份内1—12号的面积，而忽略了一些街面商铺的面积。今富源里街面建筑保存完好，富源里5号尚存。



前进一路富源里街面

从郭述申的留影推测，湖北省委所在地富源里2号，当为富源里街面商铺，照片上可见里份内房屋所没有的外挑凉台。

综上撰述，无论是作为红色记忆、工业遗产还是民国建筑，富源里都应该加以保护。笔者建议，利用富源里街面建筑设立“抗战时期中共湖北省委旧址”纪念馆，与附近的安仁里1号董必武故居、安仁里2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大陆里4—9号《新华日报》旧址，组成一条抗战时期红色旅游线路。

田联申，武汉交通科学研究所退休干部

武汉抗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下）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十二

◇ 涂文学

历史拐点

武汉会战历时 4 个半月，作战空间跨越皖、赣、豫、鄂 4 省，战场面积 10 万平方千米，双方投入总兵力近 130 万（日军 30 万，国军近 100 万），死伤总人数近 40 万（日军 12 万，国军 25.4 万余），重要战斗 1117 次，小型战斗 38931 次（参见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 年，P403），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持续时间最长、作战地域最广、战争次数最多、伤亡人员最众的战役。

在 14 年抗战历史中，武汉抗战无疑是

一个独立的重要的历史阶段。武汉抗战不仅真正开启了全面抗战的新时期，而且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打下坚实基础，“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1938 年 9 月 29 日），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内部印行），1985 年，P270）。武汉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工厂内迁及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大规模移民潮与难民救济，文化抗战与大众文化的勃兴……更使武汉抗战突破单一战争史的范畴，而向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

和文化史扩展延伸，赋予这段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历史与现实认识价值。

由于武汉会战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从而迫使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向，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时，日本全国总兵力 90 余万，其中 82.5 万用于侵略中国，仅进攻武汉即用 30 余万，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战争使日本兵力损失极巨，后备兵员严重不足。据日本相关资料，直至 1938 年 8 月 1 日，派到中国的士兵，只有 11.3% 是现役兵，近 90% 是预备役兵。再加上财力消耗过大，经济上也难以支撑持久的进攻战。于是，武汉会战后，日本对华军事上已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研究表明，武汉会战前，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占 94%，中国军队对日军的进攻则只有 6%；武汉会战后（1939 年 1 月—1940 年 2 月），日军进攻退到 56%，中国军队则增至 44%。（参见吴相湘：《时代变迁中的文武政要》（下册），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 年，P445）。

改变当然不仅仅限于军事，“战争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终于结成。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靠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更”。（〔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P555）。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武汉 10 个月的联合统治是偏离正道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和睦，内部派系纷争减弱



毛泽东主席的签名照

了，两党关系改善了。国民党领导人执行了令人惊讶的灵活政策，他们能容忍不同政见、限制政治上的打压，灵活地运用宣传。共产党的行为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1、〔美〕麦金农著，李卫东、罗翠芳译：《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 年，P154）。

由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也开始了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艰难转变，“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新华日报》1938 年 7 月 5 日）。

“武汉的实践已改变了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并重塑了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同 1，P130）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血雨腥风，全民抗战的连天烽火，使广大人民增强

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形成了新的现代国家观念。诗人王统照曾这样满含激情地高声呐喊：伙伴，你该闻到这一阵腥风，你更该牢记着他分送的言语！中国——为这两个字，从今以后，你不会迷失了你的路途，你更不会/不认识腥风的来处，魔鬼的狠毒！时代的引诱，能让你我在梦里/安度？刀光，火影，那一条条的死尸，为中国，他们不再怕刀火的威逼！为中国，他们永笑的灵魂心安意足。他们领受腥风的使命，在生与死的关口，为中国插下了血红的旗帜，伙伴，你闻到腥风，也认明旗上的二字！（参见《王统照文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P129—130）。

武汉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进化的重要转折时期，至少在政界与学界观念认识层面如此。国民党已经痛切地感受到，国家工业化与抗战关系“至深且钜”，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乃先进的工业国，而中国则是落后的农业国，欲战胜日本必须发展现代工业，“近代列强莫不以工业为经济基础，中国农业自救重要，但不应以此自足，应进而提倡工业以宏制造之能力，而应抗战之需要”。

因此，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案对抗战时期工业建设做出具体部署。《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提出“抗战与建国同时并举”，国民政府经济部据此制订了《抗战建国经济建设实施方案》，确立了战时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加快国家工业化，“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皆为农民，故中国之经济基础在于农村，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至于新兴工业，直接间接关系抗战至深且钜，必须合政府与人民之力，于最短期间谋其复兴，凡此增进战时农工生产，以奠立战后经济基础。”（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工业政策》，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P73）。二是在西南地区建立工业基地，“以西南诸省为主要地区，开发各种矿产”“建立国营重工业”，并对“民营工业及乡村手工业为普遍之调整与提倡”。

如何发展内地现代工业，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沿海沿江工厂西迁和在内地建设一批工厂企业两项重大决策。



周恩来、博古、王明与鲁兹主教

关于西迁。“固有工矿设备，应设法保存以充实内地生产能力，吾国大部分之工矿业，前此皆集中于沿海各地。抗战军兴，不免遭受敌人之摧残。自宜设法保全，俾能继续生产以应供需。业经政府拨款协助，迁入内地之工厂达一百四十家，机器材料共达二万吨，对于足以补助国防之钢铁、造船、化学、电机、橡胶及机械等工厂，尤为重视，均已分别性质迁至四川、湖南、云南、鄂西等处。河北、山东、安徽等省之煤矿设备，亦已择要内移，以为开采湖南、四川等省新矿之用。其余人民衣被有关之纺织工厂，现亦择要迁移，迁入四川者，约可有八九万锭，其他各处，亦宜筹划促进”。

关于内地工矿建设，“国防急需之工厂应积极筹设。政府除保全原有生产力外，更应创造新生产能力。吾国重工业及基本矿业之创造，抗战以来未尝停顿，此后计划进展，较前应愈为积极。例如钢铁厂、钨铁厂、电工器材厂、炼铜厂等，现在四川、云南、湖南、河南、赣西等地进行者，应克期完成。至于民生日用品所必需之轻工业，如造纸、火柴、水泥、酒精及制药等等，亦为军事上所必需者，亟应在西南西北相当地点迅速筹设。”（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工业政策》，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P76—77）。要言之，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明确了以现代工业化为主体的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基本思路，并开始在西南西北地区开拓现代工业基地以支持抗战的战略布局。

三大变化

这一时期，社会层面亦有三大变化。

一是社会控制由“清匪剿共”向“防奸除奸”转变。

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国民党内部暂时停止了军事斗争，蒋介石着手“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又以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的江西为重点。蒋介石认为“要肃清匪患，非民众组织健全，有自卫能力不可”，遂在江西修水等43县“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同时将原有乡镇闾邻等自治组织，一律停办”（李宗黄：《现行保甲制度》，上海中华书局，1943年，P26）。1932年，蒋介石又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方针，保甲组训民众的职能更为重要。6月，蒋介石在汉口成立豫鄂皖三省“剿总”，并随后颁布《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实施保甲训令》，要求一律编组保甲。依《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实行保甲的主要目的是“为严密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将1931年颁布的旨在防范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治罪法”改为制裁危害国家安全的汉奸和准汉奸，修正《民国紧急治罪法》，颁布《汉奸自首条例》，废止旧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条例》。淞沪抗战尤其是南京沦陷后，武汉渐成后方重心，人口急剧增加，难民麇集，各色人等混杂其间。有鉴于此，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拟具《非常时期清查户口联保办法》，呈请武汉行营，转饬汉口市政府切实清查户口及举办联保切结，以防汉奸。（《市党部请行营迅饬市府严厉检查户口并施行联保办法期消弭隐患》，《武汉日报》1937年10月30日第4版）。

1938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又颁布《非常时期各地举办联保连坐注意要点》，规定：“在城市地方邻居多不相识，或其他客民多于土著，良莠难分，彼此不愿联保者，得令

就保内各觅五户，签具联保。或由县市内殷实商号，或富户或现任公务员二人，出具保证书，其责任与联保同。”2月，湖北省政府汉口市等机关遵照办理。4月，汉口市保甲编组完竣。

二是社会动员从防范民众向动员民众转变。

全面抗战爆发前，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总体原则下，蒋介石国民党对于来自民间大众的抗日爱国诉求持完全反对甚至镇压态度，“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蒋的权力到达顶点时，他曾极力镇压学生游行”（同1，P118）。

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开始意识到，欲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仅仅依赖军队是不够的，还必须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宣言，直陈“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鲜明表现出转变。

至于如何动员民众，中共显示出与国民党不同的路径与方法。中共视人民群众为国家的主人和抗战的主力军，即毛泽东所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广泛动员广大民众，才能将日本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主张彻底开放民众运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保卫大武汉。指出扩大的民众动员，是第三期抗战的基础，是保卫大武汉的前提。呼吁国民党当局设立一个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并参加“策动全民抗战的一个崭新而有力的组织”——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与国民党共同开展民众组训、青年训练、民意宣导、文化宣传等民众动员工作。中共认为，民众动员必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

情，使其自觉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去。“要使人人都懂得日寇的强暴、亡国的惨痛，激励起他们保卫家乡、保卫民族、保卫自己的子子孙孙的认识和热忱，号召和鼓励他们中间的勇敢壮丁，自愿的应征上前线……”（《怎样做征兵运动》，《新华日报》1938年1月21日第1版）。倡导“好男儿要当兵”“服兵役抗战最光荣”民众自动从军抗日的社会风气。（《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增强抗战力量》，《新华日报》1938年1月21日第1版）。

三是社会成员出现空间迁移与阶层变动的双重流动。

由于战争的广泛性和残酷性，酿成中国有史以来迁移地域最广阔、迁移人口最多的被迫性移民运动。以地域而论有21个省份出现大规模难民逃亡，以难民数量而论则以数百万上千万计。这些被迫迁移逃难的人群，相当一大批到了武汉，有报告说，仅1938年6月中旬从武汉下游城市迁来的难民人数即达43万人。据统计，1938年6月武汉总人口达到150万。武汉三镇本地人口，据武汉警备司令部的清查统计，除法租界外，共计总户数158897户、总人口754816人。（《武阳汉三镇人口清查统计》，《武汉日报》1938年9月20日第4版）。这就是说，外迁武汉的人口已逾75万，与本市人口几乎一半对一半。1938年的武汉，既是华东、华北和中原地区逃难移民的聚集地，又是继续迁往西南、西北大后方的中转站，表现出两个鲜明特点：“其一，规模更大了，更多的人加入了长途跋涉的行列。正如刘敬坤所指出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及南京会战，两地均有大量的人口西迁，但这种西迁还限于社会的上层，尚未触及到社会的中下层。大量难民的内迁，是在南京失守

后。’其二，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尽管迁徙的路线仍很繁多，但西迁无疑还是成了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湘鄂赣川陕云贵粤桂等后方地区疏散，‘从完整的意义上讲，1938年的武汉是我国由立国东部沿海，转移到立国西部山区进行长期抗战的中转轴。’”（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武汉抗战时期被迫性移民运动，不仅带来区域尤其是区域城市人口的分布变化，而且因战争使大批富人财产受损，甚至有的 一夜之间沦为穷人，带来社会阶层结构的急剧重组。“在此期间，中国人口被迫重新进行分布和融合。而在此迁移过程中，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抱怨声最大。那些习惯于上层生活 的城市居民突然被时局抛在乡村的贫困之中，那些仆人、大家族，以及在上海或

北京曾经享有的舒适生活都一并随风而逝。战前与战后生活状况的强烈对比，使得五四知识分子闻一多、郁达夫等感到震惊。对于中国的农村家庭来说，这种战争的创伤更为严重。那些逃难的农民趴在火车顶上，挤在剧烈摇晃的牛车上，在经受了长时间的颠簸之后，来到了华中与西南地区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临时搭建起来的难民营中，他们努力挣扎着活下来。在这里，这些曾长期生活在封闭中的农民，与操不同口音的、不同层次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是一个巨大的平衡器。……战争移民能让城乡之间在社会、文化与语言上更长久的融合。总之，这次战争期间的难民流动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与心理面貌。”（同1，P67）。

武汉抗战使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出现重大转向，“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



在汉口的中国女兵

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P33—34）。于是，救亡替代启蒙成为抗战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一切为了抗战”是文化艺术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不管作家、诗人、画家还是学者，无论小说、诗歌、美术还是戏剧、电影、学术著作，其注意力、着力点和主题、内容无不关注民族危急，揭露日寇暴行，讴歌抗日英雄。九一八事变使文化抗战勃然而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促使文化抗战运动高涨，而武汉抗战则是文化抗战由分散到整合，由自发到自觉的重大转折。其标志性的事件便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8 年 3 月 27 日在汉口成立，会场主席台两行鲜红的标语“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鲜明揭示了文化艺术界以笔杆做武器，团结抗战的文化自觉。也正是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口号和旗帜下，抗日救亡成为最大公约数，国民党也暂时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严密管控，武汉抗战时期成为民国少有的文化宽松自由时期。“在 1938 年所有的战时首都的记载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位传媒出版者或者记者被逮捕或是暗杀”。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带来了武汉新闻出版和文艺的繁荣。1938 年前 3 个月里，日报数量从 3 种增加到 14 种，周刊数量从 20 种上升到 30 种，杂志数量 10 个月内从 30 种骤增到 200 种。不仅新闻传媒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也呈现出丰收季。

无庸讳言，仅仅从军事上认识武汉会战

是肤浅的，它带给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是革命性——一种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对此，美国学者麦金龙毫不吝啬地给予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期间，上亿人的被迫性移民运动使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图景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我认为发生在武汉抗战时期的那些历史事件和经历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保卫武汉的 10 个月里，武汉的那些社会活动家们在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所发动的一系列变革，这些变革的重要性几乎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促使欧洲文明发生转型的力量相媲美。（同 1，P44）。

尽管武汉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变，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及其军队的军阀买办性质，既严重削弱了整体的战斗力，也丧失了许多胜敌良机，蒋介石制订的那种过于复杂的指挥结构，使得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命令往往需要 6 个层级的指挥官下传才能真正得到实施，而且蒋介石的许多作战命令经常绕过正常渠道直接对战场指挥官下达，但很多命令往往自相矛盾，让各级指挥官无所适从。蒋介石历来只偏心于自己的嫡系——中央军，因为他对那些军队有着直接的控制权，而这些军队的指挥官如汤恩伯、胡宗南等都是属于黄埔系的。不用说，蒋介石的偏心不仅在中国军队各级指挥系统中产生了不和与不服，而且造成非中央军嫡系与蒋介石政府的离心离德，中央军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的指挥而无视战区指挥官的作战命令，而地方派系军队更是为了保存实力在对日作战中也是敷衍应付，所以这些都给武汉会战埋下失败种子。四川军阀杨森“蒙羞而逃”致使安庆过快失守；李韫珩大敌当前大宴官兵使得所谓

“固若金汤”的马当要塞不堪一击；信罗战役亦因胡宗南畏敌如虎，全线后撤以至功亏一篑，罗山特别是信阳最终失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其也无可奈何。

武汉会战中，中共针对日军沿江西上进攻武汉的锥子战术，向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建议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变阵地战为运动战，把防御重点放在长江沿线上，集中优势粉碎敌人沿江跃进的战略部署。蒋介石虽然部分吸收了关于运动战、游击战的建议，但总体上仍坚持以消极防御的阵地战战术被动应战，以装备落后的国军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阵地搏杀，失败的最终结局即已注定。美国学者麦金龙指出，当1938年3月长江中游的这场战役开始时，中日军队数量对比将近6:1，中国方面军队有110万人（120个分支），日本方面军队有20万人（20个分支），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中国军队数量上的优势被日军优良的装备、较高的机动性与火力上所具有的优势所抵消了。根据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员的计算，一支中国部队的战斗能力（人数乘以火力）大约是一支日军部队战斗力的1/3—1/12。因为中国方面不仅武器装备差，而且在战斗中其人员与武器补给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撇开勇气与机智等因素，这种差别就意味着在战斗成效方面，100个中国士兵往往不如12个日本士兵。国军大部分部队在作战时使用的是小型武器，如机枪，手榴弹等来作战，而大炮用得很少。中国虽然有空军，但是只能处于防御地位，还不能在战略上进行部署和使用。（同1，P30—31）。

武汉会战，本质是先进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国之间不对等的对决，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下，武汉最终失守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但如果国民党政治清明，军队号令一

致，战术灵活正确，坚守武汉更长一段时间完全是有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对武汉会战进行肯定性评价时，不讳言其历史局限性，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应有态度。还是《新华日报》社论《武汉撤退与我们的任务》说得好，“武汉撤退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应该详细客观的正确的来研讨这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教训，克服自己的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们在失去前途也不盲信前途，只有正确认识我们的前途，这才是真正的坚固不拔的最后胜利的信念”。

尾声：历史 请不要忘记武汉

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离和武汉沦陷落下了帷幕，虽然以悲剧结尾，武汉作为这场大戏的主角，却是以不屈不挠的英雄形象展现在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出“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慷慨和悲壮！

武汉“因武而昌”，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大戏都曾在这座城市上演，近代更是“四战之地”，长期的战争环境熏陶培养了武汉人临危不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品格。当日本侵略者来势汹汹，甚至兵临城下危机时刻，武汉人并没有恐慌、绝望，整个城市充满着乐观、拼搏甚至誓与城市共存亡的英雄主义气氛。这种卓异的气质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在1938年，那种乐观情绪与1937年11月和12月南京和济南失守所产生的惊慌与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1，P155）。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武汉市民慷慨解囊。7月6日至8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由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在武昌司门口，汉口世界影戏院、中山路水塔、江汉关、三



郭沫若在汉口群众集会上演讲

民路铜人像及汉阳东门码头等地设立献金台和多处流动献金点，号召市民捐献钱物，支援抗战。郭沫若曾在《洪波曲》中以《献金狂潮》为题这样描绘献金盛况：“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翻了整个的武汉三镇。献金的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在比赛，台与台之间在作比赛，简单的一句话，简直是狂了”“拿献金的人来说，人数总得在一百万以上。而人的种类，是什么都有。擦皮鞋的小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揩背的、茶楼酒馆的堂倌……是主要人物，甚至于连叫花子也有。这些人，而且是极热心的义务宣传员，跳上献金台，放开嗓子便宣传，回到自己的岗位也在不断的宣传。他们自己不仅献一次两次，甚至献十次

二十次，时时都在献，天天都在献。那一百多万元的数目主要就是靠着这些贫穷的爱国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凑积起来的！有钱的人自然也有，且看那金手镯、白金戒指等便是证明，但为数断不会有贫穷人多，所捐献的总和恐怕也赶不上。那几天当中，有好多的义务宣传员是吼破了自己的嗓子呀！有好多动人的插话不断地发生着，不断地传播着呀！”（郭沫若：《洪波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P88—89）。

我们从《新华日报》的现场报道中，也看到了一幕一幕催人泪下的感人场面：“一位六十岁的北平流亡来的老者，是靠着贩卖长生堂的无极丹来度日的，接连来了三次，捐助了一角九分，说这是他全天卖了无极丹所得的纯益，他还希望再卖几包，再来捐助”“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江汉关前的一个乞丐，褂子也没得穿的，那么大热天，还背着一件大棉袍，但却也虔诚的献上了一角大洋，并当众用一口地道的汉口话，述说一个颇有系统的抗敌思想，进而谈捐款的故事，把周围的人，尤其是大部分苦力，都感动得马上一个个跳上台来，挖出破烂的毛票，大铜子儿”“主演《热血忠魂》的影星黎莉莉女士，兴奋地跑来，把刚与罗静宇结婚的纪念戒指，毫不吝惜地脱了下来。无尽的人群，交出了他们无尽的金银……”。这里，不论高贵还是卑贱，尽管捐出的钱有多有少，献出的财物有贵有贱，然而捧出的都是一颗赤诚滚烫的爱国心。据统计，短短几天，献金总额共计93万多元。

武汉文艺界也不甘人后，由汉口市剧场

业同业公会发起抗战劳军义演，“所入戏资，不除任何开支，悉数送缴汉口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当时参加义演的剧场有 16 家，演员 2000 余人，剧种有京剧（平剧）、汉剧、楚剧、评剧、杂技、话剧等，文艺界名流郭沫若、田汉、洪深、应云卫、郑君里、白杨、光未然等大力支持，有的甚至亲自参与编剧和导演，周恩来、邓颖超也亲临观摩。

从 1937 年 9 月至 1938 年 10 月，在汉戏剧界共组织 54 次劳军义演，不少艺界名人倾情献艺，如梅兰芳就于 1938 年 4 月 28、30 日两次献演。当时报载：“为汉口市图书馆筹募基金，梅兰芳、南铁生君表演义务戏，戏码业经公布，兹经昨商洽结果，梅南二君愿加重合演双出名剧，一本为《二本虹霓关》，南饰夫人，梅饰丫环，一为南饰夫人，梅饰王宝钏，并由杨盛春、朱桂芳改演拿手武剧，其余名角，皆演其平生杰作。”据统计，汉口戏剧界劳军义演共计收入 27000 余元，加上各剧团和演职员捐款，献金共达 51000 余元，“以劳力所得，贡献于抗战建国”。郭沫若赋诗书赠楚剧名伶沈云陔，对武汉演艺界抗战义举给予高度评价：“一夕三军唱楚歌，霸王垓下叹如何。从兹艺事浑无敌，铜琶铁板胜干戈”。

武汉作为工商重镇为武汉会战乃至以后的长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撑。当上海等地的工厂西迁来汉，武汉拿出土地和房屋，使之短时期异地重建，尽快复工复产。

“估计整个战争时期，大约有 4 万多技术工人从沿海迁往内地，其中绝大多数曾在 1938 年到达武汉”“那些为战争服务的工业企业运营得很成功，这类企业为国家所控制，强调为战争而生产。很明显，这一时期武汉的工商界要服从国家战争需要，国家在那些为战争服务的工业企业中进行了一些

新的创新与新的投资”。

武汉会战期间，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布丝纱麻四局以及申新、裕华等民营纺织企业内迁后，成为为抗战服务的骨干企业，生产战争所急需的钢铁、枪械、医用纱布和军用服装等，这些企业如汉阳铁厂等都永久地留在了西南、西北地区，武汉因此付出了工商重镇沦落的沉重代价。

武汉，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在中国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共和转变的过程中，她有首义之功；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她再一次挺起脊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她是“东方的马德里”！

“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首都不能与这一时期的武汉相比……在国际上，英雄的武汉被看做是抵抗残暴侵略与可恶的法西斯主义谬论的最后理想的堡垒”（同 1，P3）。

历史，请不要忘记武汉！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不朽丰碑：抗战纪念场所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五

◇ 邓正兵 王 钢

武汉，一座抗战之城，一座英雄之城，一座光荣之城。艰苦卓绝的武汉抗战，深深改变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命运，战场的硝烟虽早已散尽，但一栋栋纪念馆，一座座烈士墓，一条条英雄路，仍在向后人述说着这段传奇而又悲壮的历史。从黄陂木兰山下杨学诚烈士陵园，到蛇山烈士祠供奉的抗战英烈；从伏虎山上矗立的郝梦龄将军墓碑，到金口金鸡湖畔永不沉没的中山舰，无不昭示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誓言。白求恩纪念馆，展示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武汉开始的救死扶伤援华事迹。武昌东湖疗养院，两位洋人在暗夜中擎起炬火，给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以生的希望。长夜已过，曙光初现，中山公园内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见证了华中日军投降的历史时刻。至此，历经血与火洗礼的武汉抗战终于结出胜利的硕果。而那些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已化作旧日租界的

一个个路牌，将中华儿女抵御外侮、自强不息的不朽史诗，熔铸进城市的肌理。

郝梦龄烈士墓：青山埋忠骨

郝梦龄烈士墓，位于洪山区伏虎山烈士陵园，墓冢坐落在伏虎山北麓，面朝西北，占地约70平方米。1983年，民政部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武汉市政府在原墓址为其重新修葺陵墓。2002年，郝梦龄烈士墓入选湖北省文保单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郝梦龄主动请缨北上，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日军为攻陷太原，企图从雁门关和娘子关两个方向进攻山西，忻口会战爆发。郝梦龄任忻口战线中央地区的前敌总指挥，率领第9军扼守忻口，与日军板垣师团英勇作战，屡挫强敌。10月16日，郝梦龄亲临前线组织反攻，在



卓刀泉伏虎山郝梦龄烈士墓

行走到一段隘路时不幸中弹，壮烈殉国。10月24日，郝梦龄灵柩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武汉各界代表4000余人素衣白马前往车站迎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授郝梦龄为上将，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卓刀泉伏虎山。

郝梦龄的牺牲，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38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郝梦龄等烈士：“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抗日英雄路：路牌昭丹心

汉口旧日租界于1898年建立，此后几经拓展，其范围南起今六合路与山海关路之间，北至刘家麒路以北、麻阳街以南，西至中山大道，东至沿江大道。全面抗战爆发前，此处许多街名带有明显的日本殖民色彩，如大正街（今卢沟桥路）、山崎街（今山海关路）等。

1938年8月13日，为纪念八一三事变一周年，激励中国军民抗战热情，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汉口日租界，改设为第四特别

区，并将区内道路全部改取抗日名称。但10月25日汉口沦陷，道路改名计划未能实现。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旧日租界街道路迎来第二次大范围改名，基本奠定如今的命名格局。其中有四条以抗战烈士命名：郝梦龄路、刘家麒路、陈怀民路、张自忠路；有五条因九一八事变而得名：长春街、大连路、沈阳路、旅顺路、山海关路。卢沟桥路得名于七七事变，胜利街纪念抗战胜利。以英雄之名，铸不朽之路，抗战精神在街巷间熠熠生辉。



1938年日租界一处街角，左上方“卢沟桥路”与“九一八街”路牌清晰可辨

烈士祠：忠魂驻山巅

在武昌蛇山南麓抱冰堂与龙华寺之间，烈士祠依山而建。这座始建于民国、重修于



烈士祠

当今的纪念空间，祭奠着所有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

烈士祠，前身为湖北籍国民党将领万耀煌部修建的祭祀祠堂，供奉在历次战斗中阵亡以及病故的13师官兵，称为“表烈祠”。1947年，“表烈祠”改造为“忠烈祠”，安放众多抗战烈士的灵位，包括郝梦龄、刘家麒等抗战将领以及所有参加武汉会战牺牲的烈士。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武汉市政府依原貌修整了忠烈祠，并更名为“烈士祠”，将武汉会战的烈士和辛亥革命首义烈士一并安置其间，同时专门开辟了“武汉会战陈列”展览。

烈士祠，这座承载着无数英灵的殿堂，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对英雄的缅怀，更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2011年，烈士祠被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

武汉白求恩纪念馆：国际主义精神的丰碑

武汉白求恩纪念馆位于武汉市第五医院院内西侧，原为高隆庞修女会诊所旧址，一栋西式三层楼房。这里，是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第一站，现为武汉市第五医院体检中心。

1938年1月，加拿大大夫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取道香港，乘飞机转抵武汉。医疗队成员包括加拿大护士琼·尤恩和美国医生帕森。在等待北上期间，武汉遭受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与助手琼·尤恩在汉阳显正街高隆庞修女会诊所，为在大轰炸中受伤的武汉军民做手术，持续工作一星期，救治了大批伤员。2月22日，白求恩离开武汉，乘火车北上延安。

为弘扬白求恩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2010年7月，武汉市第五医院在高隆庞诊所旧址建成武汉白求恩纪念馆，以“医德医风教育”为主题，介绍白求恩为中国抗战救死扶伤、牺牲自我的感人事迹，重点再现白求恩在武汉的历史片段。医院大门口立有一尊白求恩塑像，一旁石碑上刻着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文中称赞白求恩是



武汉白求恩纪念馆前的白求恩塑像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中山舰博物馆：永不沉没的百年名舰

在江夏区金口古镇金鸡湖畔，中山舰博物馆巍然矗立，经打捞修复后的中山舰停驻于此。作为专题性、纪念性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山舰博物馆生动再现了中山舰的传奇经历。2004年4月，中山舰列为全国文保单位。2014年8月，中山舰入选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大潮中，中山舰历经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中山舰事件”、武汉保卫战等多个重大历史事件。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金口江面巡逻警戒，日本海军第15航空队6架水上轻型轰炸机袭来。在舰长萨师俊指挥下，中山舰与敌机殊死相搏，遭受重创而沉江底，萨师俊等25名官兵当场殉难。

1997年1月，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重回当年殉难地金口。2011年9月，中山

舰博物馆对外开放，讲述一代伟人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及一代名舰中山舰的英勇事迹。该馆现有藏品5000余件，主要来源是随舰出水文物和社会征集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60件套，珍贵文物1716件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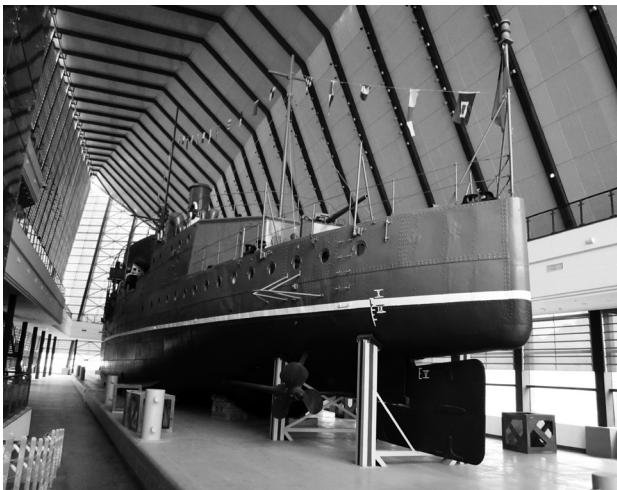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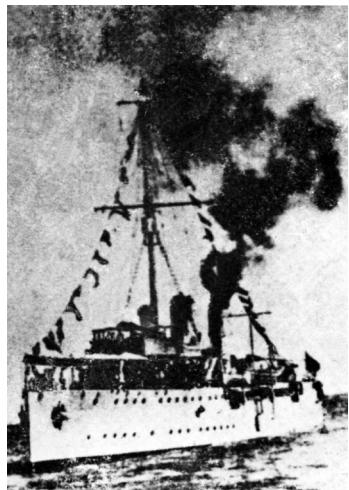
东湖卫生疗养院：武汉难民的庇护所

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位于武昌区东湖宾馆内，东湖国际会议中心长江厅东侧，毗邻烟波浩淼的东湖，为一栋中西合璧式四层建筑，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武汉沦陷时期，这里作为难民区在日军屠刀下保护了成千上万的武汉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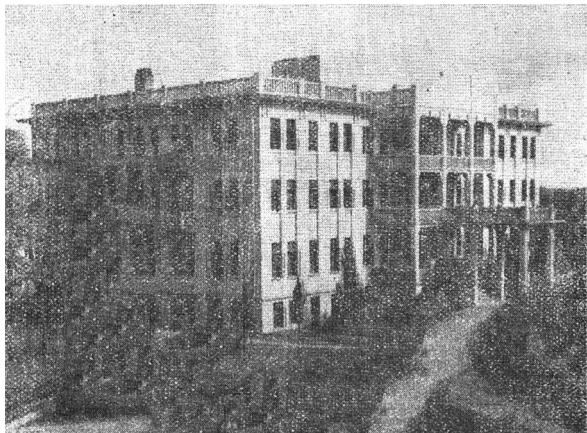
1935年，美国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医生哈里·威利斯·米勒尔(Harry Willis Miller)在武昌东湖西畔创立卫生疗养院，由德裔美籍传教士兼医护工作者艾伦·鲍因顿(Allen R. Boynton)任总务经理。全面抗战爆发后，东湖卫生疗养院曾为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医治伤病，并积极救治普通百姓。武汉沦陷之初，日军进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近2万名难民逃亡到东湖疗养

院，鲍因顿总务和米勒尔医生为之提供了悉心照料，难民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鲍洋人”“米洋人”。1939年4月，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将难民区解散。

鲍因顿总务和米勒尔医生的善举，树立起一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武昌金口遭日机轰炸沉没 / 1997年，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经修复后展出



武昌东湖卫生疗养院旧貌

段跨越宗教、种族和时空的国际人道主义功绩。2022年5月,为纪念鲍因顿、米勒尔及疗养院全体医护所做的贡献,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受降堂：武汉抗战的荣光

受降堂,位于汉口中山公园中区西侧,为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所在地,是全民族抗日胜利的历史见证,是武汉抗战的荣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指令受降主官主持各区日军投降和受降事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为第六战

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武汉、沙市、宜昌地区日军投降。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14周年纪念日,第六战区受降仪式在中山公园受降堂举行。孙蔚如接受冈部直三郎签名投降,受降日军达21万之多,并立受降碑。

中山公园受降,展示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浴火重生的胜利之姿。见证日军投降这历史性一幕的受降堂,也因之永载史册。2000年9月18日,受降堂重建开放。2019年,受降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卢作孚纪念馆：爱国实业家的不朽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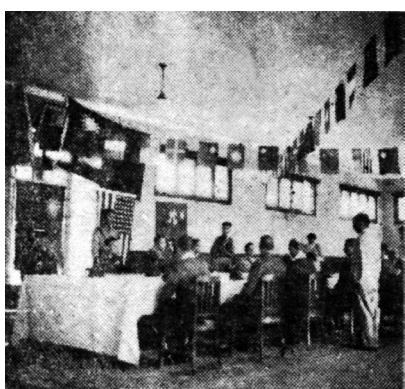
卢作孚纪念馆,位于江岸区鄱阳街7号,原为民生轮船公司汉口分公司旧址,2013年列入武汉市第八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录。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鲜明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立即组织民生公司全力抢运川军4个师、2个旅出川抗日,参加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初,卢作孚来到武汉,不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水路运输委员会主任。民生公司的重心也移到汉口,设立临时总经理室(总

部设在重庆),武汉成为卢作孚指挥运输工作的中心。1938年,民生公司抢运作战部队30余万人、弹药460多吨到前线。与此同时,卢作孚组织内迁学校的大



中山公园受降堂 / 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签字投降





卢作孚纪念馆

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营工厂的大部，其总量在 8 万吨以上。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前，卢作孚组织船队昼夜兼程，将最后一批滞留的难童和物资撤离武汉。武汉沦陷后，卢作孚又组织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史称“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因此载入史册。

杨学诚烈士陵园：长眠木兰山的抗日英雄

杨学诚烈士陵园，位于黄陂区罗汉街杨保益村，木兰山南麓的七峰山，占地面积约 200 平方米。该陵园于 1957 年为纪念杨学诚烈士而修建，1998 年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

杨学诚 1915 年出生于黄陂区研子镇一个贫苦家庭，1934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参加和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9 月回到武汉，历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湖北省委青委书记。1938 年 8 月来到鄂中，先后任中共鄂中特

委书记、鄂中区党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在艰苦的条件下，他深入鄂中农村，培养训练干部，组织抗日武装，组建应城抗日游击队，开辟鄂中敌后游击区，为豫鄂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杨学诚

1940 年 4 月，豫鄂边区新四军主力东进，留守后方的部队成立豫鄂挺进纵队路西指挥部。杨学诚历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路西指挥部政委，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委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在开辟鄂南根据地过程中，杨学诚三渡长江天堑，历经艰难，终因患结核性肋膜炎于 1944 年病逝，年仅 29 岁。2014 年 9 月 1 日，民政部公布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杨学诚位列其中。

邓正兵，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王钢，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

民国时期的江苏旅汉同乡会

◇ 陈 迟

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宗亲观念，使得同乡亲情成为在外谋生者非常重要的精神慰藉。最初，同乡们聚在一起叙乡情、祀乡神，逐渐壮大后开始缔结同业同盟、建立会馆会所议事行事，逐渐形成规范体系，发展成为非政府组织同乡会。

明末清初，汉口为全国商业重镇，不断吸引各地移民涌入，其中江苏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末民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乡会的现代组织特征也更加突出。一方面，政府加强对民间自治团体的管理，制定了相关规范进行约束；另一方面，同乡会的凝聚纽带作用日益显著，也内在要求组织日趋规范。因此，规范化管理的江苏旅汉同乡会应运而生。

同乡会组织

江苏旅汉同乡会前身为江苏旅鄂同乡会，由施省之（著名商人、上海中国济生会第三任会长）、朱弃尘（著名医师）、杨恭甫（曾任汉口医学研究会会长）、曹洪涛、赵筱吾等人于1918年发起组织。到20年代及30年代前中期，江苏同乡会主要履行集体祭祀、社会公益、同胞之间守望相助等基本职能。1938年武汉沦陷后，城市破败，经济萧条，乡贤离散，同乡会苦苦支撑未果，最终被迫解散。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苏同胞决心复兴同乡会，以此对复员过境的同乡、受灾的桑梓

和武汉社会事业都尽一份责任。1946年3月，江苏籍同仁公推湖北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吴嘏熙为代表，向汉口市政府提交成立江苏旅汉同乡会请准备查的呈文。

3月17日上午10点，在汉口劝学路的汉口市立中学大礼堂，江苏旅汉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出理事21人、监事7人，由当时在汉的江苏籍政商界要人组成。理事长吴嘏熙，常务理事沈国瑾、董奎先、李宝，常务监事施方白，监事贾士毅等是政府官员，理事王洮、夏光宇、孙保基、吕方根等则是航运、铁路、水电、冶铁等重要行业的负责人，还有各大银行的经理及其他商界高层人士。

理事会成员各有自己的工作，定时召开理监事座谈会。修建委员会专门商议房屋修缮等事宜，福利委员会专门商议信用合作社等事宜。遇到临时突发情况，及时召开会议讨论处理专项问题。如1946年苏北水灾，召开救济苏北水灾座谈会，以筹募捐款帮助苏北灾民。由此可见，江苏旅汉同乡会有着严格的管理运作。到1948年，会员人数已达3000多人，成为各地在汉同乡会中表现最活跃的组织之一。

江苏会馆

完善的同乡会组织需要建造会馆公所，以召集同乡、商讨会务、开展活动。会馆一般由同乡集资募捐而建，越是气派恢弘，越



汉口前进五路江苏会馆旧址

能显示本乡本帮的实力地位，越能增强同乡团结凝聚的底气。据1920年《夏口县志》统计，当时汉口会馆公所多达近200处，有确切建造年代的115处，其中有记录可寻的江苏会馆公所8处。自清康熙年间起，先后建立江浙会馆、江苏会馆、金庭会馆、元宁会馆、京江会馆、苏湖公所、上元会馆等一系列会馆公所。嗣后，又为了方便管理，协调同业间运输、度量衡、交易习俗及价格行为，保持本行业的市场优势，陆续将会馆发展成为以江苏吴县人商业联络所、江苏省上元帮杂货酱园公所（天印公所）、江浙绸缎商议所、江苏省徒阳坛漂四县同乡团体公所等为代表的商业公所。

现在常说的汉口江苏会馆，指的是江苏旅鄂同乡会于1924年兴建的会馆，前身即戏子街的千佛庵，现属江汉区教育局办公楼。相对来说，它的活动最频繁，至今依然保存完好。

旅鄂同乡会成立伊始，借旧法租界德兴里街面楼房的一角作为办公处。年余，



奠基石碑

同乡会逐渐兴旺，会员近千人，于是将会所迁往二德里，房屋初具规模。后来，又由朱弃尘奔走劝募巨款，由乡人季云樵承建，于1924年春在三新街落成乡会大厦，一旁同时建成的是宁波会馆。两座会馆并列而立，风格相似，均属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楼高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主入口在正中，大门上方三层开一圆窗，两侧各立爱奥尼柱。奠基铭文：“民国肇兴第一甲子，旅鄂同乡敬恭桑梓，江南江北共茲心理，形成精神奠基于此。”

可惜在武汉沦陷时期，日军将会馆侵占损毁。日军投降后，会馆又被救济署设作难民收容所，建筑环境进一步遭受破坏。

1946年春天，江苏旅汉同乡会复建后，首先就是发动各位理监事募集资金，对会馆重修一新。之后，陆续在三楼开辟大礼堂、

会议室、俱乐部、书报室，热心同乡还捐赠了家具、屏风、匾额、字画、镜子、器皿等物，布置堂皇。建设完善后的会馆，作为休闲娱乐的场所，同乡可随时来此阅读书报、畅叙乡情，逢年过节则用于聚会聚餐。1948年除夕夜，百余位同乡在会馆欢聚一堂，庆贺新年。会馆设有专供理监事议事的会议场所，并拨出部分房屋作为办学校舍。

同乡会职能

江苏旅汉同乡会的主要职能，包括暂厝安葬、扶贫济困、兴办学校、创立会刊等。

秉承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同乡会及会馆承担起为同乡提供停厝、埋葬等施棺之事，使同胞生有所寄、死有所归。

江苏旅鄂同乡会时期，由施省之慷慨捐地，在王家墩建造殡舍。后来江苏会馆建成，又建了第二殡舍。1931年，汉口遭遇水灾，第一殡舍被洪水冲垮，棺木四浮，同乡会派人收拾，移葬汉阳。

1948年清明节前夕，同乡会常务理事王雨辰（汉口孤儿院主任）带领一众会员和逝者家属，前往王家墩墓地扫墓。1948—1949年间，不幸客死在汉无人收殓或无钱购置棺衾者，会馆代为解决上百起。

江苏同乡会是自发组织的公益性质团体，对同乡济贫救灾是其主要职责，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资金来源的重头，依靠在汉社会地位高、经济实力强的江苏籍政商界名望人士。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扶贫济困的公益事业举步维艰。江苏同乡会会长、汉口市总商会会长陈经畲发起组建江苏难民救济委员会，在经济受到重创的艰难环境下，与王静斋、浦心稚、赵仲宣等人捐资

募款创设 8 处收容所，为难民提供栖身之所以及食物，还酌情发放衣服被褥。在近一年时间内，收容和转移江苏难民近万人。以陈经畲为代表的同乡会干事，为救助同乡而四处奔走呼号，或筹款募捐，或亲临照看。可以说，江苏同乡会对同乡灾民的帮扶救助，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1947 年夏天，苏北地区山洪暴发，遭遇百年一遇的重大水灾，17 县近 900 万人口受灾。江苏旅汉同乡会在会刊《江苏通讯》转发关于水灾详情的大量报道，发出为苏北灾民请命的呼吁书。8 月 26 日，同乡会在平汉联谊社举行筹募捐款救济苏北水灾座谈会发起募捐，数额超出预期。

在捐资助款的同时，同乡会也清醒意识到，这种帮扶治标而不治本。1949 年初，一边扩大救济范围以帮扶更多有需要的人，一边开始谋划成立职业介绍机构，从根源上助力贫苦同乡独立自主。

除战争、自然灾害等重大事故灾难外，同乡会还关心同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聘请专门顾问解决困难。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董奎先是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被同乡会聘为医药顾问，每日上午 8 点至 10 点在同乡会坐诊，再回民生路济生药品公司工作。武汉著名律师之一的刘瑞禾，受聘为同乡会法律顾问，经常免费接受同乡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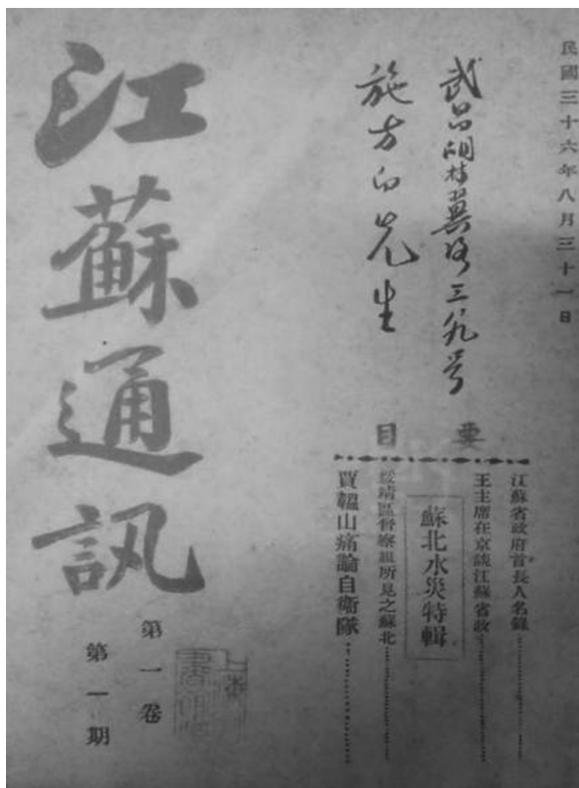
兴学重教也成为同乡会的重要职能之一。从同乡会利益来看，为了在异地将本籍势力延续下去，培养同乡子弟作为合格的接班人是很迫切的内在要求。同乡会有财力提供经费，有会馆作为校舍，也有大量同乡子弟作为生源。

1924 年，江苏会馆落成，朱弃尘以部分会馆为校舍创办私立江苏小学，标志着江苏旅汉同乡会教育事业的开始。1925 年，

李嘉禾在人和街江苏巷，又创立了私立江苏第二小学。

抗战期间学校停办，1946 年同乡会恢复后筹划复建学校，但因重修会馆、支援苏北、拨款救济、币值不稳等原因，在办学资金上捉襟见肘。于是，与云樵区公所合办国民学校，共有 12 个班级，学生达 800 余人。1948 年，同乡会募集经费将学校收回自办，规定凡旅汉同乡子弟均可报名就读，家境贫寒者可以申请学费免半甚至全免。会馆还曾考虑办“江苏中学”，但因面积受限，未能实现。

1950 年，江苏二小聘请 22 岁的滕践行任校长，滕践行后来成为武汉有名的教育家。1950 年下半年，在江苏二小校址内设立私立汉口江苏小学职工业余学校，也由腾践行主持。截至 1951 年 4 月，江苏一小有



1947 年复刊的《江苏通讯》第一卷第一期封面

12个班级，学生526人，教职员12人；江苏二小有10个班级，学生327人，教职员16人。

1956年4月，武汉市文教局完成全市私立小学的接管，江苏一小改名为前进坊小学，江苏二小改名为江苏巷小学。1958年，江苏巷小学并入民族路小学。前进坊小学则经过数次更名、合并、迁址，于1980年7月定名为红领巾学校。

除正规教育外，江苏同乡会还开设了一所短期职业补习学校——大信会计学校。创办人会计师吴英豪，江苏嘉定人士，同乡会理事之一，其创办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是当时汉口首屈一指的会计服务机构。1946年初，同乡会拨出会馆三楼房屋作为校舍，当年秋季开始招生。学校晚间开课，既方便一些业余好学者，也不影响会馆白天使用。1947年，会计学校办至第三届时，因人数激增，又在江苏会馆一楼新增早班课，增了高等会计、银行会计、成本会计三门课程。到1948年底，毕业的学生已逾千人，武汉解放后继续举办。

《江苏旅汉同乡会章程》规定，出版会刊是同乡会任务之一。随着同乡会复建，会刊《江苏通讯》也在袁明皓和周海峰的推动下，于1947年复刊。社址最初设于江汉路贯中里11号，后迁到江苏会馆。《江苏通讯》由中华印书馆印刷，其经理陶菊泉也是同乡会理事。

《江苏通讯》复刊后的第一卷第一期于8月31日出版，仅有13页内容，后期不断丰富完善。到1949年第3期，已增至60页。从内容上，可以清晰看到同乡会对本会任务的执行情况：转载江苏各地新闻动态，体现对家乡的关注；选登同乡求助信并予以书面回复，体现对贫苦同乡的救助；公布医

疗顾问及法律顾问的电话地址，方便同乡寻求帮助，体现对同乡权益提供保障的承诺；每隔4个月公开同乡会财政支出明细，体现财产管理的透明；定期更新会员名单，体现对旅汉同乡进行登记管理这一会务执行到位。此外，还有会员亲笔记录的同乡会及会馆的事迹，对一些知名会员的回忆等。《江苏通讯》是记录江苏旅汉同乡会和江苏会馆的珍贵历史资料。

江苏旅汉同乡会历经战乱动荡，仍以高度的凝聚力和极强的责任心，为在汉江苏乡亲撑起一片绿荫之地，切实践行了“让行旅有归、稚幼有学、好义急公、桑梓荫托”的宗旨。同时，不计其数的江苏人，为武汉社会发展贡献了辛勤劳动与卓越才干。

陈迟，武汉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文献资料处一级主任科员，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成员

汉口长江书店旧址与裕丰公司

◇ 韩少斌

1926年12月1日，汉口长江书店开业。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长江书店遭到查抄。8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长江书店的停业启事：“敝店于上月二十日晚间，给军事委员会派军官士兵检查后，抄去书籍甚多，并禁止发售一切出版物，不得不停业，特此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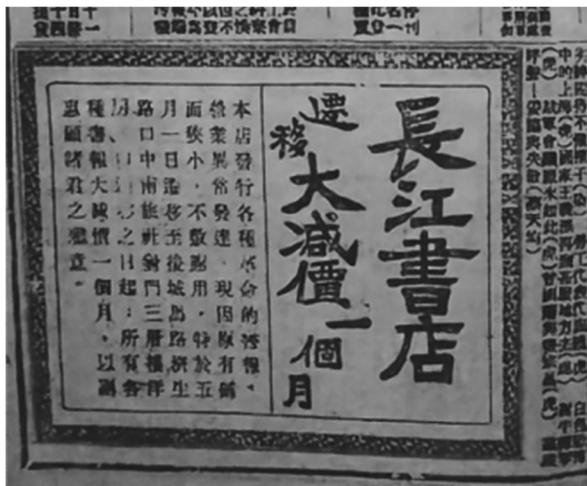


汉口中山大道371号长江书店旧址

经历风云际会，百年沧桑，今年8月7日，长江书店焕新回归，成为一处红色打卡地。

长江书店在汉口存在短短8个多月，却有两个店址。

“首先是到了后城马路的长江书店，这是武汉出售革命书籍的总机关。书店里挤满了顾客，这种热闹的情形是上海四马路各书店所没有的，我们挤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店员，但当我们向他说明我们要买最近的向导周报时，他立刻就给了我们失望的答复：‘对不起！已经卖完了，这一期第五版明天早上就可以出版，你明天早上来买吧。’他一面对我们说，一面已在和别人做交易了。‘怎么？这一期向导已经第五版了？生意这样好？’毛君感慨地说。因为书店里人实在太多了，不能不走了出来。”



长江书店迁移大减价广告

——这是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供职的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 1933 年)《武汉印象记》中的记述，反映了汉口长江书店销售火爆的场景。

据曹予庭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2辑《长江书店》一文中披露：长江书店是中国共产党继上海书店之后设立的又一出版发行机构。1923年11月间，党曾在上海设立上海书店，出版发行多种马列主义书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革命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2月4日，孙传芳以所谓“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非法封闭了上海书店，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只得转入地下。这给党的宣传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中央认为需要再建一个公开发行机构。那时，长江一带的形势发展日见好转，武汉的革命气氛尤其强烈，于是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书店。

据当时负责上海书店的徐白民回忆，长江书店由他负责筹建。不料临行前突患重伤寒，只得改由苏新甫负责。汉口长江书店成立后，继续把上海书店（包括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发行的书刊推广发行。此

外，还销售其他书店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在当时革命气氛浓厚、各界民众反帝反军阀运动日益高涨的汉口，受到群众的欢迎。

据苏新甫回忆，当长江书店开幕时，所有由上海、广州运去的书刊，三天之内完全售光。由于添配的书刊一时应接不上，曾经一度拉铁门，其盛况可以想见。长江书店除重印新青年社、上海书店等一部分书刊外，出版许多新书，并开始翻译出版列宁、斯大林著作，共计 50 多种，对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各地工农群众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影响十分深广。

上海《申报》1926年12月7日刊登的广告显示，汉口长江书店开业时间为1926年12月1日，店址设在汉口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下首。通过《汉口民国日报》《向导》等报刊刊登的广告，可把店址具体到后城马路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下首，但具体位置仍不明确。朱其华所描述的火爆场景就发生于此。也正是这种店堂拥挤状况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求，1927年5月初，店址迁移到后城马路济生马路口。

长江书店在《汉口民国日报》连续发布迁址大减价一个月的广告，上书“特于五



后城马路济生马路口旧影

月一日迁移至后城马路济生路口中南旅社对门三层洋房”。附设于长江书店内的《向导》周刊，在5月1日出版的194期广告上，编辑部、通信处及总发行所地址，也相应变更更为济生马路口。《武汉春秋》1983年第3期李子仪《长江书店》一文称，在后城马路和济生马路口（即今中山大道831号，现为中南旅社对面的汉口中药商店）。《武汉春秋》2023年第4期中金姣、田子渝《大革命时期的汉口长江书店》一文也说，为后城马路济生路上首中南旅社对面的一栋三层大楼（今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一带）。

从上述说法可以界定，长江书店后期在今中山大道前进一路口与温州城（原六渡桥百货门市部）之间，这里确有一排老建筑。从现有老照片判断，初始为三层建筑，后相继加盖。由于历史和使用者的关系，大致先后可分三个部分：上首是汉南春茶馆、新生公司；中间为初开堂药店、江汉中药商店；下首是达人堂药房、邮政局门店。初开堂药店、汉口中药商店所在处，1983年作为长江书店旧址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牌匾镶嵌在左侧的墙柱上。而今焕新回归的长江书店，也设立此处。

把长江书店和裕丰公司联系起来，始于先严提及的家中过往，说到曾祖的米店一度开设在初开堂这栋楼内。由于幼时长辈的忌讳，我对先辈的经商活动了解并不多。近十几年来因业余探究城市历史，接触一些有关资料，与先严的只言片语有了更多交集，才对曾祖的历史有了一点认知。

曾祖韩明朗、字星五，江夏青山镇（武汉青山区）韩湾人，1890年出生，幼从其父驾盐船，后从学徒做起开米店、米厂。从所能查到的资料显示，应不晚于1925年就在汉阳弹夹巷开设裕丰米店、机器米厂。1925年4月《银行杂志》第二卷第九号既明所作的调查“武汉之机器米厂”中，就列有韩星五所开的裕丰。仅在1933年的《武汉指南》上，就记载有韩星五名下的中山路、花楼街、江汉路三家裕丰。后又在花楼街靠交通路附近，另开了一家永和米店，这还不包括帮助其兄弟所开的裕丰源等米店、米厂。

据先严回忆，曾祖一直从事碾米生意和参与木兰宫雷祖殿汉口米面业同业公会的事务。由于生意不断扩大，曾在黄陂街开办一座较大规模的米厂，但毁于1944年底的大轰炸。年幼的三祖父当时在米厂玩，也不幸身亡。

1956年，在民族路开设的复兴衡米厂参加公私合营。复兴衡在1952年武汉市税务局“武汉市私营企业查帐征收户清册”中，也有所反映。

具体到中山路的米店，2024年发现收藏家周启壮先生收藏的一组1931年武汉大水时的老照片中，有一张反映初开堂药店附



1931年武汉大水时的老照片（局部）周启壮收藏

1936.3
27/2/18

湖北省年鉴
第一回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

業別	廠名 (數字及廠數)	廠址	乙、合工廠		
			年	月	負責人 總資本 合股 (元)
飲食品					
林興發器木廠	民族路 16	24	1	李龍南	2,000
王記西號	“ 161	“	2	胡錦卿	4,000
永昌	“ 200	25	3	胡全活	6,000
光順	黃桂街 101	22	6	林致榮	3,000
同興	“ 119	24	9	林致陽	6,000
惠民	“ 380	25	6	李良	4,000
裕豐	“ 211	“	8	劉少武	2,000
仁記	中山路 892	13	2	許久英	3,000
王豐新	“ 122	14	8	馬友群	4,000
裕豐	“ 455	16	3	韓星五	3,000
王記火龍	“ 616	25	1	胡云卿	4,000
寶豐	民族路 117	24	8	胡佑松	4,000
永昌	“ 314	25	3	朱品齋	6,000
寶慶	“ 180	“	5	黎地山	3,000
光豐	民生路 95	20	4	周青山	4,000
仁記米號	“ 155	“	5	許文恭	3,000
同慶	花旗街 282	18	8	黃春英	3,000



1937年《湖北省年鉴》(截图) / 1970年代的韩星五

近的影像。在周启壮先生的慷慨帮助下，我翻拍了这张照片，初开堂药店处招牌显示为裕丰公司，其下首为达人堂药店，先严的述说得到印证。在1936年《武汉电话号簿》中，达人堂地址为佑安里，裕丰则在佑安里口，这一带直到1951年的老地图上常标为佑安里。

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并不是祖上米店曾与长江书店可能使用同一座建筑，而是不久前看到1937年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的《湖北省年鉴》，对其中的一则记载产生了困惑。该书316页“工业工厂民营”续表中列有：裕丰中山路452号，负责人韩星五，设立时间16年3月。将民国纪年换成公历，16年3月即为1927年3月，早于长江书店的迁址时间5月。如果不是记载有误或出现特殊情形，那么长江书店迁入此建筑，就有了一些疑问。

浙江省政协原主席毛齐华系印刷工人出身，曾参与福生里（前进二里，已不存）长江印刷厂工作，任工务长兼厂党支部书记。他在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中回忆：长江书店开始书店规模不大，店面只有一间，后迁址中

山路大街，店堂为五开间，红漆门面，非常引人注目。

长江印刷厂同长江书店关系密切，所印的书刊均由长江书店经销，福生里与此处亦相隔不远，毛齐华的回忆应较为可靠和具体。他对长江书店五开间的描述，似与初开堂及下首达人堂不符，而上首汉南春正处于后城马路济生马路口转角，沿街开间更多，也更符合长江书店广告中“后城马路济生马路口”的语境。只是现在由于马路扩展和外观变化，汉南春老建筑失去了原弧形转角的历史风貌。从旧时风格来看，这一排建筑恐怕就是同时建成的联体建筑，长江书店在此挂牌也并无不妥，但涉及重大史实，具体位置应更经得起推敲。

当然，这只是个人拙见，特此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更多研究者与熟悉情况的人士答疑解惑，共同厘清历史原委。

韩少斌，武汉奥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本刊 2025 年总目录

阅城偶记	简 桦	(1.01)
从巴公房子到武汉关广场	简 桦	(1.01)
春晚燃爆了黄鹤楼	简 桦	(2.01)
《汉阳门花园》唱哭乡愁	简 桦	(3.01)
“江城书房”开进老银行	简 桦	(4.01)
5·18 去汉剧博物馆看看	简 桦	(5.01)
咸安坊唤醒老里份	简 桦	(6.01)
“保元风云”穿越“汉阳兵工厂”	简 桦	(7.01)
“战地记者”从江城出征	简 桦	(8.01)
吉庆街曾有一支日军“笔部队”	简 桦	(9.01)
“洋人路”一去不复返	简 桦	(10.01)
当江汉路遇见 1985	简 桦	(11.01)
远东巷引出老饭店	简 桦	(12.01)
时代年轮		
1985, 中南商业大楼搅热商海	王 钢	(1.4)
1965, 武汉版《东方红》唱响江城	王 娟	(2.4)
1985, 武汉动物园展新颜	尹新秋	(3.4)
鄂栋臣: 极地冰原上的引路人		
1985, 黄鹤楼重归白云间	庞小平	(4.4)
	罗建华	(5.4)

1995, 武汉长江二桥“环”三镇

成莉玲 (6.4)

1975, 武汉地质学院扎根江城

谌达军 (7.4)

1995, 武汉四中承办全国中运会

罗建华 (8.4)

1975, “武汉”牌手表拨响时针

肖 捷 (9.4)

1965, 十三个工业区星落三镇

王 钢 韩泽宽 (10.4)

2005, 武汉足球中超杯夺冠 陈晓桥 (11.4)

1945, 汉口《大刚报》走向武汉《长江日报》

罗建华 (12.4)

风雨同舟

三重境界三重梅

程生达 (口述) 章旷怡 (整理) (1.12)

谱写一曲新时代履职奏鸣曲

徐 莉 (2.12)

向绿而行, 守护生态青山 胡 斌 (3.11)

在民进十年印象深刻的二三事

梁守恕 (口述) 袁言勇 吴 俊 (整理) (4.10)

以“小信息”写好履职“大文章”

汪东华 (5.12)

无愧于“双岗”的责任与使命

刘海燕 (6.11)

“怪刀杨”的翰墨情怀 杨贤毅 (7.10)

在议政建言中实现人生价值 袁言勇 (8.12)

为农代言: 以科技之力, 守护健康之源

聂先元 (9.9)

向世界展示温暖而坚定的中国力量

刘淑华 (口述) 许 濂 (整理) (10.11)

双岗汇流处, 一片医者心 陆继红 (11.10)

承冯公亚佛遗风 做新时代的接力者

柴隽雯 (12.11)

九城同心

咸宁温泉: 一首流淌千年的赞歌

胡沙岸 (1.16)

寻源武汉话郧国

朱绍斌 (2.16)

应城膏雕: “膏都盐海”孕育民间艺术瑰宝

章旷怡 (3.15)

保安石雕: 一部匠人用双手雕刻的史诗

朱春华 陈立新 (4.13)

1988年, 张光年到访“武赤壁”

李城外 (5.17)

云梦皮影戏: 光影流转间的千年回响

屠 英 (6.15)

蕲艾青烟袅千年

张月生 (7.14)

有勇有谋韩先楚——听韩卫平谈父亲韩先楚将军

周晓冬 (8.16)

鄂楚风骚逐江流 (上)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鄂州元素

邱 凤 (9.13)

鄂楚风骚逐江流 (下)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鄂州元素

邱 凤 (10.15)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面世的前前后后

辛惠明 (11.15)

我与东腔戏的六十年守望

盛翠平 (口述) 王高扬 (整理) (12.15)

委员天地

在追光逐电中守护交通安全

杜志刚 (口述) 章旷怡 (整理) (1.22)

缘聚江汉 共筑梦想

范宏彬 (1.26)

我在武汉的“黄金十年”

刘萌 (口述) 章旷怡 (整理) (2.22)

从田间到高楼: 我的潮江记忆

宋武汉 (2.26)

以歌载情，我把武汉唱给你听

冯 翔（口述） 章旷怡（整理）（3.20）

从一盏路灯到万家灯火 曹 慐（3.25）

以知识产权护航武汉创新发展

余 浩（口述） 章旷怡（整理）（4.19）

用爱筑伞，撑起生命的晴空 胡文兵（4.23）

助推武汉“年轻一代”破茧成蝶

杨 宵（口述） 章旷怡（整理）（5.20）

从菜薹到莲藕：我的乡村振兴共富路

冯 军（5.24）

翻越高山，世界见证武汉女足风采

常卫魏（口述） 章旷怡（整理）（6.20）

十年政协人 一段无悔路 祝天坤（6.25）

一名海归委员的家乡答卷 周恩东（7.19）

为孩子的“童心”而坚守 陶双珍（7.22）

当好基层教育的“守望者” 沈 婷（8.21）

“透明”直播间照亮新职业之路

陶 军（口述） 章旷怡（整理）（8.24）

汉阳江风暖 医者仁心长

熊 涛（口述） 章旷怡（整理）（9.17）

书香致远，做幸福阅读的点灯人

王 婷（口述） 银 华（整理）（9.21）

我的创业路与履职情

解 勇（口述） 银 华（整理）（10.19）

一叶一世界 叶间绘美好 叶晓秋（10.23）

以法为桥，通向民心暖处 郭佳丽（11.19）

此身系乡土，此心传大爱

魏剑英（口述） 梅慧香（整理）（12.21）

商聚汉皋

追光 27 年：热爱，是最美的答案

潘小平（口述） 闻 夕（整理）（1.29）

吧哒科技的破与立

陈立军（口述） 门霁雪 周曼玉（整理）（2.29）

亲历武汉绿地中心建设背后的故事

李 煜（3.28）

餐饮人的逐梦“食”光 朱天海（4.26）

厚德实干，义利天下 万明才（5.27）

变“废”为“宝”的生长之路 蔡剑明（6.28）

三次转折探路“暖通”向新而行 赵 锋（7.25）

年轮里的城乡园林梦

邹彦奇（口述） 柳姣娇（整理）（8.27）

踏准时代的节拍，做有温度的装修人 杨道成（9.25）

母亲的酸梅汤，熬出的奋斗与传承

曾黎（口述） 熊一雄（整理）（10.27）

我要做装修界的“胖东来” 王 涛（11.22）

烽火江城

“保卫大武汉”：全面抗战的时代主旋律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一

涂文学（1.33）

1938 年“美国秘闻”中的武汉抗战

孙君恒 王富林（1.40）

序战失利（上）：安庆与湖口战役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二

涂文学（2.32）

序战失利（下）：九江战役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三

涂文学（3.33）

江南鏖战——“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四

涂文学（4.30）

江北喋血（上）：潜太与黄广战役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五

涂文学（5.31）

江北喋血（下）：田家镇血战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六

涂文学（6.32）

- 大别烽烟（上）——“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七
涂文学（7.29）
- 汉口申新四厂内迁宝鸡
刘磊（7.36）
- 浴血山河：抗战烽火遗迹——武汉抗战遗迹
巡礼之一
邓正兵 王钢（8.31）
- 大别烽烟（下）——“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八
涂文学（8.39）
- 战时首都：抗战机关旧址——武汉抗战遗迹
巡礼之二
邓正兵 王钢（9.28）
- 鹰击长空（上）——“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九
涂文学（9.37）
- 中共在武汉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程子莹（9.44）
- “三毛之父”在武汉“漫画抗战”
翁婉琳 吴继金（9.51）
- 郝梦龄将军之女郝慧英采访记
尹新秋（9.57）
- 名流荟萃：抗战名人故居——武汉抗战遗迹
巡礼之三
邓正兵 王钢（10.31）
- 鹰击长空（下）——“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十
涂文学（10.35）
- 加拿大护士尤恩的“抗战三镇行”
王汗吾（10.41）
- 中国深山里的教育事业
骆传芳 骆夏露德 / 撰 付强 / 译（10.46）
- 武汉抗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上）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十一
涂文学（11.26）
- 血证如山：日军暴行遗址——武汉抗战遗迹
巡礼之四
邓正兵 王钢（11.35）
- 董必武在汉口安仁里
何裕生 陈义 张海龙（12.25）
- 富源里：抗战初期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所在地
田联申（12.30）
- 武汉抗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下）——
“保卫大武汉”之十二
涂文学（12.35）

- 不朽丰碑：抗战纪念场所——武汉抗战遗迹
巡礼之五
邓正兵 王钢（12.45）

人物述林

- 刘伯垂：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者
刘旺琳 田子渝（1.46）
- 辛亥志士夏道南
张艳平（1.53）
- 唐际盛：从黄陂到黄花岗的革命人生
彭澎（2.38）
- 梁启超 1922 年武汉演讲佚文
肖朝晖（2.42）
- 新发现张难先给李春萱的信
罗时汉（2.47）
- 孙中山创立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
曹波（3.38）
- 雷锋，一张照片的“武汉情缘”
余玮（3.45）
- 武钢老领导沈因洛的调研风范
肖萍（4.38）
- 项英黄陂家世考
裴高才（4.42）
- 黄绍竑任职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后
席丹（5.38）
- 陈时与近代中国第三次全国运动会
陶光胜（5.47）
- 岳飞：武汉英雄城市的历史文化名片
王光艳（6.38）
- 民国汉口名人张履鳌补阙
张胜林（6.43）
- “茅盾”笔名取自武汉革命经历
侯红志（7.41）
- 湖北“革大”第一期学员杨玉麟
杨树德（7.45）
- 张之洞的玉石字画逸闻
方宏（7.49）
- 张良皋抗战时期求学重庆
张眺（口述） 雷敏功（整理）（8.46）
- 笔墨六十载，倥偬岁月稠
孙恩道（9.61）

我与爱国侨领司徒眉生的交往

孙君恒 (10.53)

陈辉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张笃勤 (11.38)

武汉青山走出的外交家魏宸组

刘谦定 (11.45)

都市寻踪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 (一) 刘宝森 (1.57)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 (二) 刘宝森 (2.56)

旧江汉关攫取非海关业务特权

李笙清 (3.49)

武昌“游乐大街”民主路 方东平 (3.57)

从“显真楼”看武汉近现代史迹

郭广迪 (4.48)

武昌凤凰山：凤凰来集，楚天灵瑞

喻 球 (4.54)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 (三) 刘宝森 (4.59)

从崇府山到花园山 (上) 董玉梅 (5.52)

武汉市地方粮票简史 赵文兵 (5.59)

从崇府山到花园山 (中) 董玉梅 (6.46)

近代汉口驻卫警的制度演变 彭 伟 (6.53)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 (四) 刘宝森 (6.56)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合影名单考

田联申 (7.52)

从崇府山到花园山 (下) 董玉梅 (7.55)

归元禅寺翠微古池 韩少斌 (7.60)

汉阳龟山赤壁画馆 张智海 (8.52)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 (五) 刘宝森 (8.55)

武汉杂技团出访南亚五国 (上)

何忠杰 (10.56)

何以同济 马先松 (10.60)

圆通宝殿：多元文化交融的佛教建筑奇观

黄书革 (11.49)

武汉杂技团出访南亚五国 (下)

何忠杰 (11.54)

民国时期的江苏旅汉同乡会 陈 迟 (12.51)

扫街探疑

中共五大开会地点考 田联申 (2.51)

汉阳泗湾：《革命家庭》的故事发生地

侯红志 (3.61)

江汉关的“关址三迁” 王汗吾 (5.62)

大陆村地名溯源 张 均 (8.60)

汉口长江书店旧址与裕丰公司

韩少斌 (12.56)

往事漫忆

湖乡古镇大集场 周 敏 (1.61)

武汉新区“六湖连通”构建生态水网

吴世纬 (2.60)

一张欢送苏联专家的老照片 陈礼才 (4.63)

外公名字刻上石门峰辛亥革命纪念墙

向虎雏 (6.61)

大成路琐记 陈德刚 (7.63)

我在武汉六中住读六载 刘松余 (11.60)